

#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 20 期 2013 年 3 月 20 日

##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张泽石谈他的一生 ·	2
怀念孙铭勋先生 · 黄鹏先 -	7
艾思奇是内控右派 · 申 渊	12
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 · 朱长超 -	14
脱胎换骨在缙云山下 · 陶渭熊-	18
临界地狱与天堂之前的呐喊 · 它 山 -	32
俯瞰原南京黄埔军校校园遐想 · 孙丹年	39
轰然一声、壮烈一举 · 牛立华	43
2012 年米寿三说 · 石天河 -	47
维权杂感 · 任 众	49
《黑皮书》读后 · 谭 松	49

《巴山夜雨》电子邮箱：[bsyy1957@Yahoo.cn](mailto:bsyy1957@Yahoo.cn)

## 张泽石谈他的一生

张泽石 祖籍四川广安，1929年7月生于上海，高知家庭出身，少年求学于雅安私立明德中学及成都私立铭贤中学，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7年夏加入中共地下党，1948年夏调往河北泊头镇中共华北局学习，同年秋从解放军返回四川从事迎接解放的地下斗争。1950年参军，1951年随军入朝作战，因部队陷入重围负伤被俘，被俘后参与领导战俘集中营里的反迫害反背叛的爱国斗争，曾任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1953年秋停战后遣返回国，回国后受到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并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直到1981年落实政策恢复党籍。现为北京市作协、中国作协会员。

### 八十载南柯一梦？——耄耋之年的一点人生感悟

今年春节家人团聚时，孩子们商量要为我举办“八十大寿庆宴”。这件令人高兴的事反倒让我夜不能寐了。八十个春秋如百驹过隙，许多往事不断涌上心头。常言道：“人生如戏”。仔细想，80年来，我在自己人生舞台上扮演过的角色真是不少，也很不一般。

22岁之前，我扮演的大都是喜剧和正派角色：长辈宠爱的乖娃、成绩优异的学童、相当虔诚的基督信徒、抗日活动中的积极分子、立志要科学救国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学子、争民主反腐败学运中的活跃分子、热情奔放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宣传队长、解放军文工队长、志愿军宣教干事等等。

到了1951年5月，我在朝鲜战场上不幸被俘后便开始扮演悲剧和“反面角色”了：被剥夺了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的囚徒、拒绝去美国去台湾的“傻瓜蛋”、因参与领导“反背叛”爱国斗争而受到美方特别监控的“死硬共党分子”、巨济岛“最高监狱”里的“刑事罪犯”、“战犯集中营里”的“战犯”；遣返回国后又成为当局眼中的“变节者”、背着开除党籍处分到处求职被拒的待业者、被强行拆散婚约的失恋者、受到“终身控制使用”的教书匠、戴着右派帽子的劳改犯、被关进牛棚批斗的“大叛徒”等等，真可谓风狂雨暴、惊心动魄，幸承苍天保佑得以大难不死。我的这段上演悲剧角色的“舞台生涯”长达三十年之久。

1981年时来运转，在我落实政策恢复党籍之后，伴随改革开放大潮，我再度扮演正面角色：职工大学校长、科技协作中心总工、民办研究所所长、自由撰稿人等等，还拥有了老教授、名作家、离休老干部这些甚为光彩的头衔。我的译作、著作曾盛销一时，我的影像镜头曾多次在电视台的专题片中出现。

正由于我扮演过如此众多的、非一般的角色，不少知情者说我的一生充满值得羡慕的“传奇色彩”！其实如今我已经意识到：无论你扮演的是最可爱的“革命者”、“英雄战士”，或是最可耻的“右派”、“叛徒”，到了你的人生舞台落幕时，你将什么角色也不是，你只不过是人世间一个普普通通的过客、宇宙中一粒随风而去的尘埃而已！而那些你曾以为永远忘却不了的悲欢离合、冰霜血泪，也不会在上留下任何痕迹。但是，我既然来到人间走了一遭，八十年来又经历过这么多风雨、见识了这么多世面，还是应该认真总结一下，或许能

给我所热爱的中华民族和我所惦记的家族后人留下点什么有益的东西。

我回想起文革中难忘的一幕。1969年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我被打成“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抓进牛棚。当天学校“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对我的声势浩大的全校批斗会，深夜专案组又派“群众专政队”的红卫兵把我押去单独审讯。那位专案组长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张泽石！我们知道你很会演戏，但是孙猴子再会变花招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慧眼，就你这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又在教会学校接受过洋奴教育、还跑到战俘营当翻译成天跟美国鬼子混在一起，鬼才相信你会拒绝去美国、拒绝去台湾！我们奉劝你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被美国鬼子派遣回来又干了哪些间谍勾当为好！”我申辩说：“我是作为坚决要求归国的志愿军战俘总代表被国家指名要回来的，请你们到军事博物馆去查一下档案就清楚了。”话刚说完，就听押着我的红卫兵喝斥道：“你他妈的还敢臭表功！”随即就感到腿上屁股上被狠狠地踢了几脚。这时专案组长向那个红卫兵摆了摆手，对我说：“我们并不想逼你招供，是你的顽固激起了革命小将的阶级义愤，你回去好好写份书面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当我被押回到囚室门口时，那个“革命小将”猛一脚将我踹进门，我趴在地上听到他的怒吼：“我看你他妈的还敢嘴硬！”我在黑暗中爬起来摸到自己的床沿，一边揉搓被撞疼的膝盖一边对自己说：“我他妈的下辈子一定要投胎工农家庭，一定要当个文盲，一定要当个体力劳动者！”又想：“当年你在清华要是老老实实读书，或者被俘后答应去了美国，就不会落得如今的下场，你这才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你完全是咎由自取、自讨苦吃！”

那年我40岁，正好到了孔老夫子所说的“不惑之年”。但我却正是从那时开始产生了一系列疑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何罪之有？”“上教会学校何罪之有？”“当年该不该参加革命？”“该不该参加共产党？”“这个党还值得我信赖么？”“当年该不该参加抗美援朝？”“该不该屈服于敌人当了俘虏？”“被俘后可不可以去美国、去台湾？”“我拼死拼活从战俘营回国来怎么反而成了罪人？”“这个国家还值得我去爱么？”……

我带着这些沉重的困惑继续我艰难的人生旅程。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我曾多方努力去寻求它们的答案。有的比较快地得到了解答，有的却长期困扰着、折磨着我的心灵！因为那些问题涉及到了我自幼建立起来的信念，涉及到我对自己在人生舞台上所扮演角色的终极评价！

现在，又一个40年过去了，对于那些问题我自认为是基本上“释惑”了！

最容易解决的当然是“家庭出身”问题，只要看看工人农民的实际社会地位，就再不会有人羡慕工农出身了。我十分感激我的祖父。正是老人家的顽强奋斗，使他自己从一个放猪娃成长为一个颇有成就的乡镇企业家，又坚决要我父亲远去北平读大学，才有了后来我的“知识份子家庭出身”，才使我避免了一辈子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卵子不挨边”的那种命运！至于上教会学校我要感激我的老爸，正是他尽力送我到教会学校，接受了长达六年的高质量中学教育，才使我得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奠定了我去搏击风浪、应对危难的人生根基。应该承认：即使在70年前，不少教会学校在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上也比我们现在的应试中学教育要好得多。

较难解决的问题是“我当年该不该参加革命？”

中国知识份子历来就有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我们那一代从漫长艰辛的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面对着国家的羸弱、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大都具有革新社会、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康乐富强国家的强烈愿望，只要有人带领，就会毅然投身革命。我正好考进了有着民主革命传统的清华大学，加上我的热情浪漫的个性，就毫不犹豫地投入了革命洪流。正是这场革命，推翻了专制独裁贪污腐化的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政权。后来之所以出现了“该不该参加那场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的问题，是因为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不但没有如它所承诺那样去执行“新民主主义”、建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自由康乐富强的新中国，却反而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苦难！

15年前，我去台湾探亲，目睹了我当年要打倒的国民党在台湾实践三民主义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也感受到了我曾参与的那场国共内战所造成的中华民族的可怕伤痛与裂痕。那时我敬立在台北中山纪念堂孙中山先生的塑像前，遗憾地想：“中山先生，要是您能多活十几年，将国共合作维持下去，建立起民族民主联合政府，领导民众齐心协力去实行三民主义，就不会出现那场骨肉同胞自相残杀的暴力革命了，而一个民主自由康乐富强的新中国也早就屹立在地球上了！”只可惜历史不能按照我们的愿望去改写。

至于“我该不该参加共产党？”“这个党还值得我信赖么？”，是困扰我最重、带给我痛苦最深的两个问题，我将放在本文最后去诉说。

先说“我当年该不该参加抗美援朝？”“该不该屈服于敌人当了俘虏？”“被俘后可不可以去美国、去台湾？”……

1951年3月，我和战友们都是满怀保家卫国的激情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跨过鸭绿江的。我们那时当然不知道美军并不打算侵犯中国，更不知道中国是正在为金日成的冒险狂热与斯大林的自私狡诈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我们至今仍然自豪于参加了那场战争，因为它证明了我们是忠贞的爱国者，是坚强的中国军人。

“你既然是坚强的中国军人，那为何又束手就擒当了美军俘虏？”这才是多年来困扰我和难友们的沉重思想包袱。我从战俘营回国后被开除党籍的一条重要罪状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时我确实还剩有一个手榴弹，我因为被身边一个小宣传队员哭喊着阻挡着没有把手榴弹引爆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我一直为自己没有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羞愧，甚至也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只因见到难友们太需要我这个会英语的大学生跟大家一起去共患难，才促使我重新振作起来。

朝鲜战争中两万多名志愿军战俘，绝大多数都是在战事失利陷于敌后因伤残病饿失去抵抗力而被俘的。我们已经是为国尽力为国受难了！然而，正是“被俘可耻”、“投降即变节”这种违反人道的封建战俘观害苦了我们。它既是促使我们那一万四千名难友违心地背弃自己的亲人故乡去了台湾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年毛泽东对我们这七千名拚死拚活回归祖国的难友给予“开除党籍、军籍、终身控制使用”这种重罚的根本缘由！毛的封建帝王残暴本质也由此可见其一斑。

我初中高中的英语教师都是美国老师，考上清华大学后，更是立志要去美国留学。因此，当被俘后我被邀请到美军第八军司令部担任文职翻译人员并承诺停战后送我去美国上大学时，

我真的心动过。最后被我婉言拒绝了，并非我不想去而是不能去。对我来说，那时的美国就是敌国，我要是去美军部队当翻译就是去当汉奸，这是我不的人格我的尊严绝对不能接受的！对于当年的这个决定，我至今也未反悔过。我真的庆幸那时年轻的我竟能具有那份坚贞：为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做到了拒绝诱惑、心甘情愿去承受战俘营的苦难。

我更庆幸自己能跟难友们一起通过两年多极其艰辛的斗争，终于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尽管回来后受到过极大的委屈与磨难，但我也获得了只有在祖国才能获得的珍贵的亲情友情爱情，以及近 30 年来所享有的学习和创作的权利、尊严与人身自由。我正是在那远离祖国的异国孤岛上、在战俘营的黑牢里，才真正懂得了“祖国”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当我弄明白了我们回国后所受的磨难完全是来自那个独裁暴君，我对祖国就只剩下爱和担忧了！

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去台湾探亲，每次去我都要去看望在台湾的难友，深入了解到他们当年所受到的身心折磨与政治陷害、他们到台湾后所受的歧视和他们对亲人故土的痛苦思念。我不再把他们看成是“经不起考验的懦夫”。我们不能把愤恨和指责放在受到残酷迫害的难友们身上，真正的罪人是那些制定强迫战俘放弃回归祖国权利政策的美国政客和执行这个罪恶政策的美国军人与他们豢养的走狗。同样，如果那时有别的会英语的难友答应了去美军部队当翻译，我现在也不会骂他是“汉奸”，因为他可能对那场战争的看法跟我不同，甚至他可能有亲属在美国，他应享有选择其人生道路的权利。

### 现在来谈谈“我该不该参加共产党？”

我在信仰共产主义之前较深地接受过儒家文化、西方文化的熏陶，甚至笃信过基督教义。然而在我 1946 年到了清华大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一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就把我们这些急于推翻旧世界的青年学子给俘虏了！1947 年夏天我就加入了共产党。现在看来，正是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把我推进了共产党队伍。1948 年夏天，我在冀中解放区住了三个月，看见在那里政府清明廉洁、人民安居乐业，便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那时绝对没想到全国解放后我们共产党会变得比国民党更加专制独裁，更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们共产党的官员会比国民党官员更加贪污腐败！

多少年来，我苦苦地从现实中、从理论上去寻找共产党为什么会变质的答案。在我去香港、去台湾、去泰国、去韩国、去美国时，曾经从不同社会制度与历史发展的对比中思考过，但帮助我更深入更全面地弄清问题本质的，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通过各种渠道读到的许多有价值的书籍、资料 and 文章，让我较多地了解了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真相，特别是共产党主要领袖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迄今为止我得到的答案是：我当年去参加共产党没错。那时我真诚地想参加革命，而那时共产党的表现也让人相信它真是一个要救国救民的革命党。至于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以及“老大哥”苏联共产党）一旦成为执政党之后就立即变成了专制独裁政党甚至成为一个无力挽救自身腐败堕落的政党？看来是源自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这里既有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暴力革命、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的错误理论指导，也有列宁斯大林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错误样板，还有我国两千年皇权社会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与崇尚“忠”

“义”之游民文化的深厚传统，更有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们在本身素质上那些先天不足的缺陷！

那么，“这个党还值得我信赖么？”

如果这个党继续这么专制下去、腐败下去，当然不值得信赖了。但是，我还保留着对它的希望，希望它能在历史的推动下、在人民的督促下、在众多优秀共产党员的追求下向好的方向转变：变成一个不需要用枪杆子来维护的，而是由民众真心用多数选票选举出来的清廉、民主的执政党。

我看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前的共产党和 60 多年前我加入的那个共产党已经大不一样了：党组织的中坚成分已经不再是以农民和游民为主而是以国家公务人员和社会知识精英为主了；广大党员的文化素养、独立思考能力更是今非昔比。今天党所处的外部环境也跟 60 年前大不一样了，在国内，社会进步巨大，人民觉醒显著；在国外，全球化代替了两大阵营对立，五大洲民主浪潮澎湃。当我在台湾看见国民党竟然能够主动将手里的军队归还给国家，并在开放党禁、报禁之后继续推动民主宪政改革，甚至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和平政权轮替，我就想：中国国民党能够做到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就做不到？

应该有那么一天，我们共产党的有魄力又有智慧的中央领导成员们，终于突破了权贵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并化解了那些因激愤于社会不公要求回到毛时代的同志们的疑虑，成功地在修改党章党纲的党代大会上，以多数票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按照恩格斯的遗愿转换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并正式宣布立即启动民主宪政革新。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活到这一天，好让我带着这个天大的喜讯去会见已经先我西去的亲友、校友、战友、难友们，让大家都含笑于九泉啊！

这些想法我平时极少跟儿女们交流。他们不愿我“苦了一辈子，却守着清福不享，一天到晚瞎操心”，他们希望我“了却尘缘、淡泊人生”。但我却怎么也做不到，真辜负了孩子们的好意！

回顾从我出生至今的这八十年，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我的张氏家族、中华民族、地球星族，都是极其不平凡的八十年！在这八十年里，虽然经历了可怕的战争、灾害、危难，但也催生了巨大的科技、经济、文化进步。我少年时代幻想过的“顺风耳”、“千里眼”已经通过手机、互联网及卫星电视实现了，连美丽的嫦娥奔月神话都已变成了现实。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又让大家惊讶地看见了中华民族乃至地球星族同舟共济的感人情景。80 年来，“地球村”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真是有了长足进步。这是整个人类从贫困愚昧快速走向富裕文明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中华民族也正在从艰苦危难的阴影中走向辉煌。

**我曾经感叹自己“生不逢时”，现在看来应改为“生逢其时”了！**

人老了喜欢忆旧，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是我儿时山青水秀的故乡，幼年时家长老师的关爱，少年时快乐的学校生活，青年时的梦想、追求与为信仰而甘愿承受的苦难，中年时跟相濡以沫的妻子共同为子女为学生所付出的爱心与辛劳，退休后撰写自己人生经历时的激情，外出游览时所见到的旖旎风光，以及跟亲朋好友聚会共享亲情、友情时的温馨。

由此看来，我已经度过的八十载并非南柯一梦，而是一段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真实人生。

幸哉！足矣！

## 怀念孙铭勋先生

黄鹏先

孙铭勋（1905—1961）先生，是贵州平坝县人。1927年离开家乡，到南京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学习，后留晓庄幼儿园工作。他边教学边研究，写有师范教本《幼稚教育》（与人合著）、《乡村幼稚教育经验谈》等专著。后到上海，在陶先生指导下创办劳工幼儿团，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工人子女创办的幼儿园。1935年在南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到延安肤施师范学校任教，被延安边区政府聘为教育委员。1939年7月，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孙先生参加了筹备工作，担任社会组主任。皖南事变后，孙先生由党组织安排撤退，到甘肃玉门油矿创建职工子弟小学嘉峪关分校，当时他已是享有盛名的幼稚教育专家，可那里只有低年级两个班，生活、工作环境非常艰苦。他勤勤恳恳办教育，业余创作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他把作品念给学生听后又不断修改，创作态度十分严谨。他爱学生，常同他们一起游戏、生活，极其耐心地教育孩子们，真如一位慈爱的母亲。其实早在新安小学、育才学校时，学生都亲切地称他“孙妈妈”。1945至1946年，孙先生在重庆社会大学任教，兼生活教育社重庆分社编辑。育才学校大部分迁往上海，小部分留重庆，1948年孙先生担任重庆育才分部主任，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境况中把重庆育才保存下来，还有所发展。同时还用“拓林”笔名写有《从行知诗歌看教育》等文章。

1951年电影《武训传》挨批判，孙先生在《新华日报》、《大公报》、《人民教育》等报刊上被点名批判，被停职反省。随后“三反”运动因募捐办学遭疑又被定为贪污分子，被批斗、关押，受到种种人身侮辱，被迫自杀。虽经抢救过来，这又加上破坏运动，自杀叛党的罪名而被开除党籍。

运动结束，被释放后，为了养家糊口他曾同时在两所学校谋职，每天在重庆江南江北地奔波。后经朋友帮助，孙先生调到西南文教部任研究员，做编审工作。1953年调动到西南师范学院，在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任“儿童文学”教员，后来又调到中文系讲授“儿童文学”。当年全国师范院校除华东师院外，都还没有开儿童文学这门课程。

1955年5月，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先生选编、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全体创作的儿童诗歌习作《儿童谜语诗》。1956年12月孙先生用笔名拓林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经他搜集整理的《四川儿歌》。1957年孙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春节前夕在政治迫害与饥饿疾病中，离开人世。经其妻子邝忠龄的不懈奔走努力，1979年1月“改正右派”，1981年5月恢复党籍。经由田伯萍、胡晓风等人的努力，1984年11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由先生的妻子邝忠龄编选的《孙铭勋教育文选》。

我于1954年8月末到西师中文系乙班读书，那时，三年级开设有儿童文学课，任课老师正是孙铭勋先生。对孙先生的大名，早在读中师时，就在《新华日报》专门开设的批判孙铭勋思想的讨论专栏里看到过，印象深刻。因爱好儿童文学，常到孙先生家中，他总是热情接待。我曾送过收有我的儿歌习作的《大月亮》、《排排坐》（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儿歌集）给孙先生。我读三年级时，他给我们讲授了一年的“儿童文学”课，那时他已是副教授。他讲课生动形象，内容丰富，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他讲课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他是不念讲稿的，分析作品总是先介绍内容。他是讲故事的高手，语言精炼感情充沛而富于幽默感，富有浓郁的童趣，描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十分鲜活。我们进入情景后，就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这也引发了我们的创作热情，我们班喜欢儿童文学写作与研究的可多啦。记得孙先生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他有时要干咳几下，便苦笑着幽默地安慰我们：“请同学们不要害怕，不会传染给你们的。”后来才知道，那是因被逼在1951年自杀未果留下的后遗症。课余时间，孙先生也受邀参加学生的活动，记得在我们班举办的1957年元旦晚会上，同学们热情地欢迎老师表演节目，孙先生还唱了一首故乡的山歌。孙先生课余还常到西师幼儿园去观察孩子、听课、参加教师会议，还把搜集编选的儿歌、故事提供给教师使用。有时还和孩子们一起去看儿童电影专场，观察孩子们的喜怒哀乐。

孙先生发给我们的《儿童文学》讲义，有理论，有作品选读及分析，经我们各自动手装订起来有厚厚的一大本。1957年6月的一天下午，孙先生来到我们桃园学生宿舍找到我，给我看一封信。原来是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济恩写的。卢济恩在系资料室见到孙先生编写的校际交流讲义，便写信向孙先生要一本。孙先生叫我把装订好的这本寄给卢济恩，承诺下一年还我一本新讲义，并叫我与卢济恩通信，交个朋友，因为都喜欢儿童文学。我和卢济恩通过几次信，还收到他寄赠的他的大作《出门去玩的时候》（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后因“五七”浩劫中断了联系。直到1990年代在一次现当代文学学术会议中午休息时，与上海大学文学院邓牛顿教授闲谈，因他是南开大学毕业的，谈起卢济恩，原来他们是同学，卢济恩笔名卢方，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文学评论》。真是山不转水转。我和卢济恩联系上了后，还来信邀请赴京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当时校领导不同意去，上课期间耽误课时过多，补课麻烦。终于在1993年6月9日参加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六盘水年会上见面了（他是学会邀请来讲学的专家），谈起那本孙铭勋先生编写的《儿童文学》讲义，对他帮助很大，可惜早已丢失了。早先我也曾向同班同学打听过，谁还保留有孙先生的讲义？真可惜，只因不间断的被“运动”，直到文革的大劫难，宝贵的有独立见解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讲稿，终于没能流传下来。我退休后应邀回渝参编《学语文》杂志，家里的电话号码变了，卢济恩打电话到我任教的学校，又再次联系上了。他退休后还告诉我他家的住址，欢迎我去北京玩。

1956年时共青团的工作搞得很活跃，胡耀邦当团中央书记，那时师生关系融洽，我们学习劲头也很高，思想活跃，能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地学习。为了建设祖国，学好本领，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各系科先后成立了科研小组。我们年级两个班在孙先生的指导下，成立了儿童文学科研组，推我为组长。当时主管科研的姚大非副院长曾召集我们少数重点科研组长开座谈会，儿童文学科研组受到院领导的关心与重视。在孙先生的热忱指导下，我写出



了几万字的《论儿童歌谣》。经孙先生审阅签字的论文，原定在1957年6月中文系首届学生科研成果报告会上摘要宣读的，因“整风反右”而夭折。我曾寄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来下落不明。这年7月，我多年的日记也被查抄，一直没有归还，而且领导还叫我们要“消毒”，要主动给投寄有稿件的报刊去信说明自己的“右派”身份。1958年4月受处分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下放干部一起到农村，我们是去劳动改造。6月里学校宣传部通知我返校去，原来是因为贵州人民出版社寄来了样书，要我把还没寄的所有文稿全部交到宣传部，从此，我就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长达20多年。这《论儿童歌谣》其中的一章《论儿童歌谣的特点和表现方法》因发表在西师《桃园》创刊号上，才得以保存下来。同样孙先生的一首儿童诗《老树的故事》，也是因发表在《桃园》创刊号上得以保存下来。那还是我向先生约稿得来的。只印了两千本的《桃园》文艺双月刊创刊号，至今也难寻觅了。

195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忘的一年。一生多灾多难的孙铭勋先生，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必然是在劫难逃。1957年5月11日全天，西师召开全校教授、副教授、讲师学习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孙铭勋先生为陶行知抱不平，认为陶行知受了极大的委屈，是被几口口水淹没了，强调陶先生的办学精神，提出应当对陶行知进行表扬。6月初高教部通知各地大专院校停课助党整风，西师党政领导还给师生作了动员报告。在党团组织的大力号召下，孙先生应邀在大礼堂“文科论坛”讲了他对考试问题的意见，考试制度应该改革，仅凭一次书面考试是不全面的，应通过多方面的考核，比如口试、写论文等实践能力。后经“无限上纲”也成了罪状。当晚我与文学社的几位骨干（由我担任总编，两位副社长鞠鹏高、胡学富任副总编），在编辑部正忙于编油印小报《鸣放园地》，据我们派出的记者回来讲，孙先生在发言中还表扬了我写的《论儿童歌谣》，还谦虚地说，他都写不出来。他是鼓励学生创造性地学习，要有独立思考能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求具有创新能力。为学生喜爱的孙先生终于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被迫劳动改造。像我这样的几百位在校接受教育的学生，也被扩大化为全国一百多万人中的一分子。我在留校“劳动察看”期间，有时遇见孙先生，只能在前后无人时，抓紧宝贵的时间交谈几句。

先生的夫人邝忠龄老师在西师附小也受到牵连。她也是儿童文学作者，1956年我们曾一起参加重庆作协儿童文学组的活动。1958年4月，我们班4位受“二类”并非法律处分的学生、系里肖成智老师、同属西师的附小邝忠龄老师和工农速成中学的一位数学老师，这几位同甘共患难的老师和在校学生，在下放干部刘老师的率领下，到离西师不远的北碚著名抗日爱国名将张自忠将军墓园所在地梅花山对面的红槽房同一个生产大队劳动改造。这年8月，我们下乡的几百个“二类”学生劳动力，因大炼钢铁工作需要，被学校回收，响应中央的号召转赴新成立的“西师钢铁厂”，为实现“1070”超英赶美的伟大政治任务日夜奋战。邝忠龄老师她们继续留在了农村。

一场噩梦醒来后，1979年初寒假我从贵州回渝期间，县教育局叫我设法买点初中、高中语文教学参考书回去，开年后办培训班急需参考。我是因公出差到西师，在图书馆遇见邝忠龄老师，才知孙先生早已去世。她是来查找孙先生发表的论文，为编选《孙铭勋先生教育文选》做前期工作。邝老师要我为她提供我所知道的孙先生的情况，后来她都写进了书里（参

见《孙铭勋教育文选》重庆出版社 1984 年版；在邝忠龄写的《孙铭勋小传》中讲了学生对教学的反映，南开大学学生卢济恩写信索要讲稿两件事，这本书我手头还保存有一本，是在贵阳买到的特价书）。在去拜访教过我们外国文学的曹慕樊先生时，谈起孙铭勋先生，曹老师告诉我，孙先生的女儿刚才从他家出去，问我看到没有，我说在巷道看到一个年轻女生的，只是不知道是孙老师的女儿孙丹年。后来，县里想派教师到西师去进修，又叫我出差到西师联系，我曾到邝老师家去过。

2004 年重庆《中国儿童诗》创刊，我写了一篇《怀念孙铭勋先生》发在第二辑上，文中还遗憾地说过，可惜孙先生编写的儿童文学讲义，连同印发给我们做参考的他创作的儿童诗，至今也无法寻觅了。就因为这篇短文，主编彭斯远告诉我孙先生的女儿孙丹年的电话，经联系后，才知道她正打算出版一本孙先生的纪念文集。她到我工作的《学语文》杂志社面谈，我建议她与主编柯愈勋联系出版事宜，找彭斯远写篇序文，再约请孙先生育才学校的同事和学生写回忆文章。我负责组稿的几位是我西师中文系的高年级同学，市老年大学的罗淑芳、重庆师大的李敬敏、西华师大的周子瑜、贵州师大的陈锐锋（没写稿），他们都是同班同学。经孙丹年的努力，这本纪念文集已基本编成，我参与了校对工作。发现赵庆祥提供的孙老师的讲义，是一九五五年九月供中文系三年级用的“初稿”，一看内容就知道，这并不是我们 1956 年 9 月使用的讲义。我们学这门功课时，讲稿的内容更丰富，可惜至今还没发现这个版本，我们两个班有近一百人，竟没有一位同学保留下来。孙先生搜集整理的《四川儿歌》还是藏书家诗人柯愈勋提供的。经他编辑成册书名定为《老树的故事——孙铭勋纪念文集》，作为他主编的《中国儿童诗》文丛第二辑中的一本。

2004 年 10 月 23 日，孙铭勋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在重庆育才中学举行，这本纪念文集送给参会者每人一册。我也应邀到会并且发了言。到会的多是白发苍苍的育才学校的老校友。邝忠龄老师在会上讲了话。当天会后，孙丹年向我表示谢意，为出版纪念文集尽心尽力，我说这是当学生的应该做的事。

第二天即 10 月 24 日，重庆《经济报》在第 3 版上以《纪念儿童文学开拓者》为题报道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孙铭勋追随陶行知来到重庆，辅助恩师到各地保育院选拔难童到育才学校入学。1948 年主持育才学校教务工作。1957 年，上海《小朋友》杂志第二十一期发表了孙铭勋设计、詹同绘画的童话连环画《老鼠的一家》。该童话在读者中产生很大积极影响。孙铭勋先生一生创作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文学研究论著，堪称‘儿童文学开拓者。’”

10 月 24 日《重庆日报》在第 2 版上以《纪念教育家孙铭勋百年诞辰》为题报道说：“孙铭勋是陶行知先生的杰出学生，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重庆育才中学前身——育才学校的创始人之一”，“为重庆育才中学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

2005 年孙丹年告诉我，她要写一部孙先生的传记作品，要我提供一点资料。她 1982 年毕业于西师中文系，赴藏工作过八年，返渝后在市文化局工作，业余发表文章有数百万字，曾送我一本她的小说散文集《走过西藏那些路》。她是重庆市作协会员。我给她讲过，我在贵州教书时，寒暑假参加省中师函授广播学校评卷，任语文大组长，有一年正好有位来自平坝县教研室的老师参加评语文试卷，我问过他知道孙铭勋先生不？他知道，县里编印的文史

资料上介绍过。

2006年我到泸州参加大学时代的班友聚会，经到会者集体回忆，统计出下面这份资料，写进她的书里：“1954年9月入学时，全班50人，因退学、休学、抽调参加肃反外调而“留级”的，到1957年“这个班，全班44名同学，正式划为右派的12名，占27.2%。这个班，还有被开除团籍的5名，留团察看1名，团内警告处分1名，取消中共预备党员资格2名。连同正式划为右派的，占全班人数将及一半。”（参见孙丹年著：《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贵州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430—431页）

按中央的“编制预算”，各单位划右派分子的百分比应该为5%。2000年10月由西师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第三章中，关于错划右派人数，是这样公布的：“全院教职工和学生，先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共612人，占全院总人数5855人的10%以上……”（见该书第116页）我们班严重超标的原因，是因为班的“反右”领导小组三人中有两人的亲属也是“右派”，一是系总支宣教委员，她男人被划为“右”了，一是“火线”上任的团支书，她的亲人也被划为“右”了，于是她们心态变异拼命“超标”，最终害人害己。

2008年2月，收到孙丹年的签名赠书：《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这40万字的传记，记录了孙先生多灾多难的一生，在幼儿教育、生活教育、儿童文学教学的开拓与创作等多方面取得的成就，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写好这部传记，作者走访了众多父辈的老战友、同事、学生，在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还数次到贵州平坝老家访问，得到贵州有识之士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传记得以在贵州教育出版社于2007年12月出版。

除作者自序外还有四篇序文，我只认识其中的两位，一是西南师大的刘明华，当时的中文系系主任，是1998年参加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大会时，遇见毛宗璜老师，经他介绍认识的，写序时担任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在序文《知行合一的理想主义者》中指出：“孙铭勋坎坷的一生，反映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孙的最大悲剧，是他信奉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5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苏式教育思想和教育管理体系之间的尖锐冲突。”“但他仍然继承了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儿童文学教学上坚守自己的理想热情。这从他在课余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指导学生成立的‘儿童文学研究小组’……他的教学实践的目的，正合于今天的教育观念：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等等”。文中提到的“儿童文学研究小组”就是上世纪1956年我们三年级学儿童文学课时，成立的“儿童文学科研小组”。

一是1996年在贵州师大参加省语言学会年会时，认识时为东道主的贵州师大中文系领导人顾久，他有位中师同班同学在我校工作，我们交谈过。写序时担任贵州文史研究馆馆长。他在序文《孙铭勋影射了一个世界》中说得好：“这本传记是孙铭勋先生的女儿所著，可贵处是他为亲人负责而披沙淘金的功夫和处处洋溢着真情实感。……这本传记应传世，孙铭勋先生应长垂史册。”

作者 黄鹏先，原贵定师范学校（今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定分院）语文高级讲师，退休后应邀回渝参编《学语文》杂志，曾任小学低段版执行主编，现住重庆。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协会员，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本文曾请孙先生的女儿孙丹年审

看过。

作者通讯处：重庆巴南区鱼洞刘家岗 69 号 3-4-4 邮编：401320

联系电话：023—86992771、13650508743

## 艾思奇是內控右派

申 渊

以《大眾哲學》享譽數十年，對中共奪權貢獻巨大、曾為毛所敬重的艾思奇，從五十年代起就受到毛的親信陳伯達康生的打擊排斥，劃為右派。鬱死於文革前夕。

中共体制内哲学家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人，蒙族，原名李生萱。他是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时的名将黑斯波里的第十八代后裔。祖父李曰垓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的功臣。父亲李德润是滇西华侨儒商，常年往来于云南各地与缅甸仰光之间，他的中西合璧教育观对艾思奇的成长有莫大影响。蔡锷是他父亲的义父，临终前嘱托艾思奇祖父李曰垓襄助四川督军罗佩金多为民国革命作贡献。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艾思奇从小具有民主意识，聂耳是他的好友。早年留学日本，后与章太炎研究过国学和经史。他可用日文和德文对照阅读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伏尔泰、鲁索、培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颇有研究，尤重墨子的实践观。

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七年赴延安。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共掌权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先后担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著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艾思奇文集》等。

### 蒋介石拜倒在《大众哲学》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读书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李公朴任主编，柳湜、夏征农和艾思奇任编辑。艾负责撰写《哲学讲话》、《科学讲话》栏目。其间他用一年时间，为《哲学讲话》专栏写成二十四篇文章，结集出版，形成后来的《大众哲学》。

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日常生活现象，解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各种世界观，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如《哲学并不神秘》、《卓别麟和希特勒的胡子》、《猫吃老鼠》、《不是变戏法》等，使哲学走下神坛，为普罗大众所接受。

《大众哲学》出版后迅速风靡全国，发行三十二版。不少年青人受这本书鼓惑走上共产革命道路，奔向延安。当时有《大众哲学》动员十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引起国府的警觉。一九三一年顾顺章投奔国府后，中共组织在上海被迫收敛，左翼文化运动万马齐喑，哲学界却一枝独秀，脱颖而出，出版各种流派的哲学译着，《大众哲学》是其中之一。艾思奇的书，在共产革命的低潮中救了中共一命。

艾思奇女儿李昕东于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纵横》杂志着文《大众的哲人：我的父亲艾思奇》。她记道，一九八四年蒋介石先生高级幕僚马壁来到她家，对她和她母亲说了一番令人

难以置信的话。蒋介石曾经说过：「我不是败给了共军，而是败给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艾思奇夫人和女儿惊得目瞪口呆。蒋介石怎么可能说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话来呢？

原来蒋介石一再说过，得人心者得天下，蒋指的人心可能就是从《大众哲学》开始失去的。在这以前，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二月搞「新生活运动」，目的就是为了赢得民心。认为「以力服不如心服之有效」。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却「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蒋介石曾指着主管党务的陈立夫的鼻子骂道：「共产党能写出这本《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写不出来？」蒋介石把《大众哲学》推荐给蒋经国、蒋纬国看，而且自己还常年放在案头翻阅。

马壁（1912-1985）湖南湘潭人，历任国府要职，一九六一年返回大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住在北京国务院宿舍木樨地二十二号楼，曾为艾思奇后人写下诗句：

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

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

卷中小字注曰：「一九四九年蒋介石检讨战败原因，自认非败于中共之军队，乃败于艾思奇《大众哲学》之思想攻势，一九五七年提到《大众哲学》余悸犹存。特写小诗七言绝句一首书赠。」这首诗如今悬挂在云南腾冲《艾思奇故居》内。

### 陈伯达妒才诋毁《大众哲学》

蒋介石如此高度评价的艾思奇，却为毛泽东和他的鹰犬所不容。可能受到家学渊源的熏陶，艾思奇为人处事作风低调，不善张扬，更不擅长玩弄政治。平日是潜心学问与教学，颇有书呆子、老学究气质。

一九五三年，兼任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在食堂里突然走到艾思奇跟前，竖起一个小指头说：「艾教员是九品官」。意思是说，你的职位比七品芝麻官还要小。在阶级斗争年代，这位毛泽东政治秘书、号称中共理论家的陈伯达不会轻易用威胁和嘲讽口吻开这样的玩笑，必然非同小可，事出有因。

接着陈伯达指责艾思奇就是靠一本书《大众哲学》吃饭。这本书错误百出，翻开任何一页都可找到错误。从此以后针对艾思奇的各种流言蜚语开始出现。在批判会上，他违心地承认各种莫须有的错误，他希望尽快解脱出来，返回教学岗位。艾思奇解释道，《大众哲学》是他年轻时写的一本书，幼稚之处在所难免，所以在一直不断修改中。

艾思奇开始不断检讨，并承诺「以后再也不写这种粗制滥造的伪劣产品」，他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就此取消，从一九五三年起，出版过三十二版的《大众哲学》便不准再出版了，反右运动后，更从书架上消失。

一九五三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党委作出结论：「对作为教员的艾思奇在教学与科研中的错误进行检查」，决定对他进行严肃处理，并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呈报，此事不了了之。

### 领袖产生的偶然谈性犯大忌

李昕东文章中说，艾思奇遭到这般突然袭击，心中郁闷可想而知。妻子王丹一因医疗事故住进医院，艾不敢向妻子透露半点消息。艾的挚友、曾任毛秘书和卫生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建议他径直去找毛泽东申诉，他亦不敢去。

事情远不到此为止。从五十年代初到文革以前，中央党校爆发过三次大论战，影响扩大至全社会，构成文化大革命的预演。论战双方的代表中有艾思奇和杨献珍。这三次论战本来不过是哲学教学中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其中「一分为二」原来是「从现象到本质」科学分析过程中所作的比喻。然而「合二而一」问题一再上纲上线，发展为全国性的政治打击运动，成为陈伯达、康生等毛泽东鹰犬打击异己的手段。康生炮制了「三次论战」的权威史论。在文革浩劫中，「三次论战」又扩大成为「十次论战」，排斥和打击政治对手。

至于艾思奇被陈伯达等人在反右运动后期定为内控右派一事，则更为蹊跷，也更令人发指。艾思奇有一次在讲解哲学上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时候，他解释说，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要进行伟大的革命，产生一个领袖是必然的，但是这个领袖由谁来当则是有偶然性的。有的学员当即提出：「毛主席成为领袖是否有偶然性？」艾思奇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有偶然性」。

### 反右中被定为「内控右派」经过

中央党校的学员都是有来头的县团级以上干部。这个问题显然是个政治陷阱。艾思奇是个犯有前科的人，这样的回答是彻头彻尾攻击伟大领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他自投罗网跳进了阳谋圈套。陈伯达抓住机会联系他以往一系列「反党错误」，定他为党内右派分子。

在这一系列「反党错误」中，有一条是与另一名党内右派柳湜「狼狈为奸」。柳湜是一九二八年便加入中共的老党员，长期从事文化和谍报战线地下工作。反右运动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党组副书记等要职，还是中共八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反右运动中柳湜被打为右派，由柳湜又牵连艾思奇。早在一九三四年他们二人在中共外围组织「社联」中，有一段合作共事的关系，在上海《申报》和《读书生活》专栏共同撰稿。因为是文人，有共同语言，以后经常来往，切磋一些学术问题。

划右派的又一个原因是在延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度受到毛泽东青睐，成为毛泽东座上客，经常应邀与毛探讨哲学问题，并有书信来往。艾思奇把书信和手稿交囑夫人王丹一珍藏，进城后王丹一拿去荣宝斋装裱这些书信，不料被康生妻子曹轶欧发现，她提议公开发表。艾思奇不同意说「不可招摇」。此事又得罪康生，亦为祸根之一。

艾思奇划为右派上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未获批准，却按内控右派处理。从此以后他成为「内部控制使用」的专政对象，不断被人打小报告，散布流言蜚语，诸事烦扰，不堪其忧，使他郁郁寡欢，度日如年。因此在一九六六年三月文革前夕早逝，享年仅五十六岁，但若非早逝，文革大劫又岂能逃过被斗死的命运？

(2012.05.15)

## 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

朱长超

在中国，人生真像是变戏法。同样的一个人，一会儿可能是阶下囚，一会儿可能是座上

宾。钱伟长就经历了一场富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变戏法。

钱伟长的前半生是悲剧，后半生则是喜剧。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剧，而是一幕大喜剧。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在美国工作得好好的，据他说，美国给他的年薪 8 万美元，这点工资，据研究，比当年的美国总统还高 5000 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但是，他却还是想回国。回国也不错。想不到的是，因为主张教授治校、主张通才教育，这点想法与主管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治校意见不合。意见不合也罢了，这是社会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见与明天的意见还会不合呢？但是，与中国的领导意见不合，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钱伟长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 22 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从美国万里迢迢回国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还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或纠错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运动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钱伟长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这个圈子。他从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历史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不仅他当了二十二年贱民，在流行株连之风的中国，还害得他儿子女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 22 年发生的种种凄厉的故事，每一个知道中国历史的人，都是应该明白的。

有人说，社会就是大学，当右派也是大学。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里，历练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 年底，将一封右派朋友们给他的信交给了当年领导全国反右运动、并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个人。这一次交信，为党国立了大功，也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右派党员倒了霉，被一个个开除出党，也害得总书记胡耀邦下了台。而给交信的钱伟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席。红楼梦上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来，这真是有点儿道理。这一封信，改变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

我写到这里，似乎先要停顿一下，说明一下。我知道，中国经这许多年的中宣部的调教，培育出了一大批没有头脑的愤青，他们人多势众，思想简单，出口粗野，情绪激烈。他们看到与报上流行语不一样的说法，马上会破口大骂。我的这篇文章也许扫了一些人的兴，有些人看了会很不高兴。我是准备挨骂的。我要说的是，我说的话，是真的；我说的道理，是真的。我相信，我说的事实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的道理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愤青们要骂，也先冷静一下再骂，这也是一种节约生命能量的办法，符合低碳经济的原则。

好了，言归正传。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7 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 年底的样子，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转辗交到了中央军

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与他们是不同的。”（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厉，大加批判，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它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无职无名，却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的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国家领导人了。一封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这样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认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 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领域的事以私人领域的方式处理。你可以不回复方励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参加不支持那个会议，也可以直言批评他们准备开会的想法。意见可以不同，但如果坚持这个边界，我认为是合理的。而将私人信件上交，应该考虑到可能给朋友带来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行为的性质

第二，这封信上的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的会，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分子分子已经纠错，平反，或改正。摆脱了右派分子阴影的人们，从历史的角度讲，反思一下这场运动，对国家对个人，也是有益的。同学一场会想到同学聚会；邻里一场，会想到彼此走动；右派一场，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点苦水。这于国无损。于党无害。就是中国的宪法，也说集会公民的权利。钱伟长对此信的处理，失当了；邓小平对此信的看法，过敏了。反右运动，99.99%的人搞错了，虽然中国之大，只邓小平为首的几个人坚持着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连薄一波、李维汉、周扬等当年反右运动的大将，都一个个表示了忏悔。这样，邓小平会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励之等人的右派三十周年座谈会，



矛头是对准他的。他的脚上的尖眼仿佛被不当心踏上了一脚，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马上行动起来要显示自己的无比的权威。一时间，他指示要开除这几个右派分子的党籍，决心要赶走人们爱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制度大抓阶级斗争的一个常见现象。在东德解体后，大量档案解密了。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当年在私下里发的一句牢骚，对党的领导的某些不满，都被放进了自己的档案。告密的人不是别的，正是自己当年十分亲近、十分投缘、甚至十分相爱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丑陋，自杀了。告密问题还似乎拍了一个电影，还得了奖。告密和告密产生的迫害是一种罪恶，这当然要由专制制度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说是一种高尚行为吧。告密者总不能称为精神的高贵者吧。（谁说的，在毛泽东、邓小平之流眼里告密是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

在中国，告密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类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末期，袁世凯在谭嗣同夜访时慷慨陈词，表示支持变法，支持光绪，答应拘留荣禄。但是，谭嗣同一走，他就向荣禄和西太后密告。结果是，光绪皇帝被软禁瀛州到死，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一场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于失败。

在新中国，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它还有美名，曰，向党靠拢，与党保持一致。在告密者来说，是减轻自己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伟大的中国当年不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称，也以告密者大国著称。如果将来中国的档案解密，我相信中国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芜的作家，向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最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语。舒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造发酵，创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导致数千人挨整，数百人流放，数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伯钧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钧的知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钧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时候会顺着章的话茬，有时候则主动挑起话题，让章发表感想，他则默默地记着，好向上头密报。他虽然没有进过告密学校培训，但水平很高，他竟赢得了章伯钧一家的好感。他每次从章家出来，肚子里和脑子里总是都有所收获。他会通过电话或写信向有关领导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处是并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为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者角色的方便，冯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时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三、还有其它一些好处，例如，有关领导请他在有名的饭店吃一顿饭，送他几张紧张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种自豪感，等等。

受到许多中国人敬仰的科学家钱伟长，也曾经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对被告没有好处。而对自己则不无好处。至少他们希望会有好处。所不同的是，第一，他们告密的密度不同，一个密，一个稀。冯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说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钱伟长难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异很大。第二，接受

告密的层次不同。冯亦代将密告之于处长科长之类的小角色；而钱伟长所将密告到了老佛爷手里，从告密的层级来讲，是最高级了。第三，同是告密，后果迥然不同。冯亦代只得到几张演出票，几顿好饭。是告密的小儿科。而钱伟长则大受邓小平表扬，迅速成为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一个只是小打小闹，一个则不告则已，一告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看来，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摆摆地摊、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虽然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钱伟长则不同，要么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笔生意，一辈子就够吃够用了。他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将来有学者经数年辛勤，写成《告密学》的巨著，我想钱伟长的案例一定会写入书中，也有可能永载史册。这当然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归来，为国效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萎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近来，辽沈晚报著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方周末所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上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贵者”吗？他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后的钱伟长是怎样想的？临死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告密又是怎样想的？我相信，他的灵魂是不安宁的。就如冯亦代一样。

## 脱胎换骨在缙云山下

陶渭熊

### 黑色“四一六”

1958年4月16日，是我人生中一个黑暗的日子。

上午，年级党支书杨一之就通知我收拾行李，午后一点到一教学楼1212教室听候安排。我知道“已决犯”马上就要押往服刑地了，有一种解脱但又恐惧的感觉。自从戴右派帽子以

来，我一直生活在孤立、冷漠、仇恨之中，没有谁和我说话、招呼，即使对面走过也视而不见。我早想离开这座语言的监狱了。但是押往何处？是农村还是工厂？是内地还是边疆？是凶还是吉？对于今后的日子一片迷惘。

午后 1 点，西南师范学院受二类处分——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 100 多名右派学生，带着行李都到一教学楼 1212 教室集合，接受副院长王逐平的训话。我迟到了一步，这个供 120 人上课的大教室已经座无虚席，迟到的大约 20 来人只能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洗耳恭听。由此我估计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至少在 120 人以上。训话之后，就全部押送到农村劳动改造。王逐平的训话老调重弹没有多少新意，不外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必须脱胎换骨重新作人之类。但他最后几句话叫人不寒而栗，他说：“贫下中农对你们的反党言行充满刻骨仇恨，你们不好好改造，谨防挨打。他们的拳头和扁担是不认人的哟！到那时就不要怪我事先没有说明。”不管他说的是实情还是恐吓，一幅恐怖的图景预示了前途的黑暗，牛马一样的日子在等待着我们！

训话完毕，就由各系的老师把我们带到指定的地点。这些老师是半年前下放到北碚金刚乡劳动锻炼的干部，我们也到那里去接受改造。

我们——生物系 6 名二类右派学生，被教动物（一）的岳清泉老师带到金刚乡前进大队花灯生产队监督改造。大家跟着岳老师低着头心情十分沉重，竟没有一声言语。岳老师看大家情绪太低落，走到一个小山头处叫休息一下。我们放下行李回望北碚小城和西师校园，一种莫名的凄凉袭上心头，这座美丽的城市是我们十分向往的地方，而被我们视着母亲一样的美丽学校，是我们理想和希望的寄托，如今它无情地抛弃了我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到它的怀抱。想着想着，泪水竟悄悄地润湿了眼眶。

一小时的行程结束后，我们来到花灯生产队办公室。不一会惹来一大群社员的围观，男女老少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目光直逼我们，像看动物园里的怪物，我们感到十分难堪，都低着头不敢正视。

不久，事先安排好的房东来了，分别把我们带走。我被房东王大爷带到第三组一个叫官家黄葛树的大院。走进大院，又是一阵叫人抬不起头的目光的攒射，惊奇、疑惑、陌生、冷漠，一齐向我射来，对于一个举目无亲沦落异乡的戴罪之人，那是一种何等的孤独和凄凉！更让我彻骨寒心的，几个儿童正在唱“右派右派，是个妖怪”的歌谣。环境何其险恶！这就是我脱胎换骨的地方吗？

### **杜鹃啼血**

我的“寝室”就在王大爷的堂屋里。屋子十二三平方米，是吃饭、会客、过路和堆放杂物的地方。屋角处两条高板凳上放了一张门板，铺上稻草，打开带去的草席和被盖，就是我的床也是我的家。我不知要在这里居住多久。无助和绝望突然涌上心头，使我疲惫不堪，要喝水，没有；要洗脸，没有；要洗澡，更不可能。草草晚饭后就倒在床上。

官家黄葛树坐落在缙云山白云寺之下，白云寺的粉墙灰瓦掩映在树木丛中依稀可见，山上的茂林修竹就像一匹巨大的绿毯从山顶直盖下来。其时正是“杨花落尽子规啼”的时节，丛林中杜鹃日夜不停地啼叫，凄怆、悲凉、哀怨，声声入耳，令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我想

起了杜鹃啼血的故事，那悲苦的声音是为我遭受不幸的鸣叫，还是对人对世险恶的哀叹？是对我年幼无知上当受骗的惋惜，还是对阳谋构陷者的谴责？是对我流落异乡无依无靠的同情，还是对当局无情打击青年学子的愤怒？是对即将到来的全民大饥荒的呐喊，还是对为政者恣意疯狂的警告？……

我无法入睡，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我本来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但是去年大鸣大放的时候，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想起了家乡生产队长利用权势长期霸占奸污某年轻女地主，致使舆论鼎沸人心涣散，生产生活无人过问。这样的丑恶行为对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多么大的侮辱！出于对党的忠诚和爱护，我写信向家乡区委进行了揭发……万万没有想到，虽然那生产队长后来被开除党籍证明我言之有据，但是我却以“攻击诬蔑党的基层干部，向政府反攻倒算”的罪名定为右派分子；再加上“为地主家庭翻案”，“攻击农业合作化”，“诬蔑统购统销政策”这些我想都没想到的“罪恶”，就以“情节严重，态度恶劣”享受了二类右派学生的“待遇”。可怜我的幼稚与轻信，可怜我对共产党的信赖与忠诚，更可怜父母和家人对我的期望！如今我戴了帽子受了处分，被剥夺了在校学习的权利，我有何面目把屈辱告诉家人？而我的屈辱又能向谁倾吐？亲爱的父亲、母亲！你们已经受尽了政治上的折磨，你们知道儿子也将继承你们所受的折磨吗？饱受饥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弟妹们！你们知道你们的兄长也在水深火热之中吗？……我想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们，但是我能告诉你们吗？

杜鹃仍然不停地啼叫，我心乱如麻

### 奴隶生活

一夜无眠，迷迷糊糊刚闭上眼睛，院子里的高音喇叭响了。那是乡里用广播统一全乡社员作息时间。凭感觉这时还没天亮，但各家各户的房门也都吱呀吱呀地打开了。我不得已揉搓着惺忪的眼睛到厨房舀水漱口，王大爷递来一把锄头说：“还漱口！都上班了。”声音流露责备。我赶紧跟着上坡。

薅了两小时包谷，7点半广播响了，大家迅速回家吃早饭。

8点，广播又响了，大家又扛着锄头上坡；行动迟缓的社员把稀饭倒进嘴里，边吞边跑。上午劳动到12点钟下班，中间只休息20分钟。

中午休息1点半钟，妇女们做饭、洗衣、喂猪，男人拿着锄头、粪桶做自地。我一上午没喝一口水，又渴又饿又累，但不敢休息，跟房东一起去自留地除草。吃过中饭，离下午上班也就不远了。

午后1点半，广播声再起，上班时间又到了。连续劳动6小时后，直到7点半天快黑时才收工，中间也只休息20分钟。虽然天快黑了，大家还是利用最后一点余光到自留地干活，做饭喂猪，忙碌不完。

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下吃过晚饭，已经十点钟了。我浑身疼痛，腰酸腿胀，手心打了水泡。一身汗臭，想洗澡，哪里有条件！柴火干贵，社员都没有烧水洗澡的习惯。和王大爷一家人挤在一个小木桶里洗帕脸，就倒在床上就睡了。几天后我才在屋后小沟里找到一些水，也不管干不干净，浇些水来擦洗身体。下乡近半年，我没洗过一次澡。

从早晨 5 点半到下午 7 点半，中间仅仅两小时吃饭和做家务时间，每天 12 小时被牢牢地捆绑在公有土地上，农民是不折不扣的奴隶——农奴。而我，已成为农奴中的一员，身不由己，失去了自由，像一条被牵着鼻子的牛，任人摆布。

以后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劳动还要艰巨。例如挑粪淋包谷。王大爷交给我的粪桶上写着桶重 6 斤，装粪 98 斤。挑着这 104 斤的担子我战战兢兢，到了地里还不能从肩膀上放下来，因为缙云山脚下的旱地，全是坡地，没有放平粪桶的地方。必须把粪水继续担在肩上，在地里一边走一边淋。这是一个费力又难做动作，我第一次尝试竟将一挑粪打倒，泼了一身粪便又压坏了庄稼，狼狈尴尬自不待言；更怕损坏庄稼被扣上“破坏生产”的罪名。

有时还到北碚街上的公共厕所去担粪，来去二十多里，肩头针锥似地疼痛。

插秧的时候一天 12 小时扒在水田里，腰杆像要断了一样。

挑谷子，一挑湿谷子一百四、五十斤，咬紧牙关也得挑……

奴隶生活使人筋骨疼痛身心疲惫，但是为了摘帽复学，就是一把屎我也要捏着鼻子把它吞下去。

### “耍星期”

那时金刚乡的农民，十天休息一次，他们叫“耍星期”，可以上街买卖或做其他事情，这是农民唯一能自由支配的时间。

好不容易熬到了“星期天”。本想到北碚街上放松一下，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一是上街要请假，不准随便离开生产队，也不准右派之间互相串联；二来休息日经常要参加青年突击队的“义务劳动”和给房东干活。

本来我们劳动就未得分文，还要“义务劳动”，找一些临时性的劳动来强占我们的休息时间，折磨我们的身体，消磨我们的意志。

如果仅仅是我们几个同类在一起劳动，彼此谈谈心得交流思想互相慰藉，还能缓舒一下紧张与疲劳。但常常和一帮共青团员一起干活——那当然是监督我们。这个时候就分成两个不同的阵营，就有一些铁面无私的面孔指责我们这里不对那里没做好。就连平时有一面之交还算友好的小伙子，也变得非常陌生而冷漠。在集体之中，每个成员都只能体现集体的意志而排斥一切私情，这个时候体现得特别真切。

记得有一次我们和共青团员们一起拆毁一向草房（按乡党委的部署消灭草房全都挤到瓦屋去住）。我们在墙缝里发现了许多壁虎的卵并捉到了几条壁虎，生物系的学生对它当然有浓厚兴趣，就围在一起观察研究一番。不料团支书一声断喝：“你们在干什么？还干活不？龟儿右派没求鸡巴明堂，一条四脚蛇都要看半天。”

最尴尬的是休息的时候，团员们都坐到一起，人多势众，我们六个右派被挤到一边，显然是有意孤立我们。此时开始唱《社会主义好》，当唱到“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时候，他们全体敞开五音不全的嗓子气势汹汹地以仇恨的目光直逼我们。我们只能低头忍受这无端的侮辱。

学校按月拨给房东 6.5 元伙食费，而我们的伙食开支不过 2, 3 元，虽然房东得到的好处是那时其他农民望尘莫及的，但我们还得给房东干活以搞好关系，不然处处吃亏。记得胡少

仁老兄就因为下班后坐下来看一会报纸（他的住在队办公室隔壁，能看到重庆日报），就被他的房东骂道：“抖起一个知识分子的架子，你还是地主少爷？要我们煮饭供养你？”他为此吃了大亏，顿顿给他吃的稀饭不但照得见人影，而且不用筷子可以把稀饭喝光而碗上不粘一粒饭。这样的教训我们敢不汲取吗？所以我们都利用休息时间认真地给房东干活。

### 看见了自己的辜丸

谢天谢地，我的房东王大爷王大娘都十分宽厚善良。我自然事事主动：做自留地，上缙云山打柴、挖树疙蔸、到煤矿担煤。煤矿在 20 多里以外的山上，来回 40 里，担着 100 斤煤下 20 里路的陡坡，是一项巨大的体能消耗和筋骨折磨，回到家里，通体湿透一身酸软，真可谓“脱胎换骨”。

铭刻在心至今 50 余年犹有余痛的，是 1958 年 5 月下旬的一个休息日，房东令我上山挖树疙蔸（做燃料）时摔了跟斗把阴囊划破，辜丸都露出来了！

那天早饭后我按房东的交待带着锄头、背蔸来到国有林，挥臂举锄将那些被盗伐后的树桩挖蔸刨根，不久就装了一大背。我便扛着锄头背着树疙蔸慢慢地往回走。那树蔸实在太重，就像一座小山压在背上；背篋也太大，在我瘦小的背上摇晃不定。我艰难地行走着，走到一条田坎的缺口处，田坎很窄，大约 30 公分，缺口却很宽，有 80 公分，需要跨一大步。但负重一百多斤实在难于跨越。我试了试，大着胆子一跨步……殊不知轰的一声摔到两米下的另一水田里，那一百多斤重的疙蔸压在我身上使我不能动弹。我大声呼救。一位在附近割草的农民知道了，大声喊：“王大爷！你家右派摔到水田里了。”但他并不来救我，因为老百姓被共产党的宣传吓住了，不敢接触我们，怕别人说他与右派划不清界限。这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我党为了整治某些人，就把这些人“处理”成“非人”。例如要整地主，就说地主是“寄生虫”，要整右派，就说右派是“妖怪”，然后就可以用任何冷漠、无情乃至残忍的手段来对待这些“不是人”的东西。这个农民能够帮忙喊叫一声也算有良心了。20 分钟后王大爷过来，把我从泥水里拉起来，很不满意地说“尽是些桩桩。”就背着疙蔸走了。他怪我没多刨些树根。

我坐在田坎上感到下身疼痛得厉害，俯身发现裤裆戳了一个大洞，脱去裤子一看吓呆了：原来那锋利的锄头，一个尖角把我左腿根部戳了一个洞，正涌出殷红的鲜血，沿着大腿一直流到地上；一个尖角刺破了阴囊，露出了椭圆形的、比雀卵大的辜丸！阴囊和辜丸都是白色的，与身体上其他伤口都呈血红色完全不同；那种白色很恐怖，像放了血的猪肉，使人想到死亡。泥水浸透了伤口，很痛；既有伤口的疼痛，又有辜丸的闷痛——凡辜丸受到过挤压或撞击的男人，都知到是怎样一种痛法。我已经不能行走了，趟在田坎上呻吟。刚才割草的社员也不见了，我向谁求救？孤独无援啊！我试图站起来走回家去，但是伤口的鲜血流得更多，辜丸向下坠落胀痛得哎呀一声又趟下。看见不断涌流的鲜血和暴露出来的辜丸，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内心一片恐慌！不断问自己，怎么办？怎么办？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想：会残废吗？会成“骗人”吗？如果成了“骗人”那成什么样子？不就跟太监一样了吗？男不男女不女的，说话尖声尖气，行动笨拙迟缓，我还有什么面目生活在这世上？……我还是一个未满 20 岁的童子呢，竟然遭受如此巨大的苦难！我着急得泪水长流。是谁把我赶出学校抛到

这荒野之外无人过问？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更想父母，如果父母看到我如此受难该多么心痛，会怎样的关照我！可是父母在哪里？我想亲人，亲人在哪里？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世的苦难已使我这个不满 20 岁的青年领略殆尽！我看着带有鲜血的锄头，如果再挖深一些，挖断我的股动脉，鲜血就会像喷泉一样喷出来，我就会奄奄一息地闭上眼睛，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去天国寻找快乐，那样我就永远地解脱了。你为什么不再挖深一些？你这可恶的锄头！

四周一片死寂，除了虫鸣与鸟叫。我好像置身于远古洪荒，广袤的天宇之下就躺着我这个受伤的青年。谁向我伸出救援之手？

过了半点多钟，见我没回家，王大爷很不高兴地又走过来，问：“哪个了嘛？”我指着胯裆说：“大腿戳了一个洞，在流血；‘米米’也遭了，露出来了。”他“啊”了一声，赶紧去找干部。又过了一点多钟，队里派了两个同类，生物系的罗继红，地理系的石如玉，找来一把凉椅捆绑成滑杆，才将我抬回学校卫生科医治。医生说：“左腿的伤口深 1.5 厘米，幸好没伤到动脉；阴囊划破了，幸好睾丸是滑动的，受到撞击但还没伤及内部，不然你就成‘善（骗）人’了。”他花了很长时间清洗伤口（但可能清洗不彻底，后来阴囊内长了几个结节，年轻时没事，年老体衰后时时作痛），缝合包扎后依旧抬回房东家。后来无人照料伤口化脓竟躺了 20 多天，换药、拆线都是我拄着竹棍艰难行走半天才回到学校卫生科治疗。

### 莘莘学子

对于一个求知欲旺盛积极向上的青年来说，还有什么比被剥夺学习权利赶出教室更悲哀的呢？我们虽然被赶到农村，但仍然心系课堂不忘学业。好在生物系学生在广阔的农村还可以学到一些知识。

我们六个人，58 级的胡光伟、罗继红。59 级的张福泽、胡少仁，60 级的刘和璧和我。刘和璧身体有病不久申请回家自谋划生路。胡光伟是有名的学习尖子，被批判的白专典型。他利用星期天上山打柴的机会，采集竹节虫标本，他说发现好几种，其中可能有未记载过的新种，要专家才能鉴定。就找来废玻璃瓶，用每月仅一元钱的“困难救济费”买高度白酒做成了几个漂亮的标本保存。张福泽上山打柴发现了许多缙云山特有珍贵植物缙云槭的幼树，他很高兴地说，看来这个物种不会绝灭；还把锥粟、板粟、丝粟、石粟的形态特征作了详细记录。而我自己，从杜鹃的叫声中分辨出至少有四个不同的物种，于是也从一元钱的“月收入”中节约开支买了《中国的鸟类》，以后又买了《鸟类野外工作手册》、《鱼类野外调查》等书。我现在都难以想象这一元钱的月收入怎样开支过来的。那个时候对于知识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情感，可是能让我们学习吗？

罗继红参加过抗美援朝，在部队搞过报导。他重操旧业将农民在雷雨来临时，半夜里打着火把犁田截水栽秧的事写成新闻稿在《重庆日报》发表。不料遭受管理右派的岳清泉一顿臭骂：“谁叫你投稿的？你有什么资格投稿？你的目的是什么？一个右派分子，不好好劳动改造，写什么稿子？我告诉你们，你们没有这个资格！”

他把话锋一转，说：“这是一次反改造事件！最近你们之中有一股反改造情绪，有人不好好劳动改造，去搞什么标本采集、植物分布调查，啃专业书！这些都是不允许的。除了老

老老实实劳动改造，你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这些话当然是岳清泉奉乡党委的命令来警告我们的。听了这些话，一个个都垂头丧气。

### 王长春老师的“右派罪行”

下放花灯生产队劳动锻炼的生物系老师有四人：岳清泉、汪静、倪秉直和王长春。王长春是讲授无脊椎动物学的年轻女讲师，是我们十分尊敬和喜欢的老师，学识丰富、语言流利、表达清楚、态度和蔼，还十分注意教学方法，听她的课十分轻松，好理解好记忆，可以说是一种享受。

我们到生产队不几天，她就被叫回学校，再过几天，她把行李都搬走了。我们以为她结束了下放劳动的生活回校上课了。

又过了几天，学校来人召集干部和一些社员开会，搜集王老师的右派言行。原来她被打成右派！据参加会议的社员讲，大家都说王老师是好人，根本没有任何反党言论。后来主持人从房东那里得知一些生活小事，一是王老师用香皂洗脚，一是用肥皂洗尿桶，主持人如获至宝，立即上纲上线，说王老师“在下放劳动期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生活方式，拒绝思想改造，拒绝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好大的帽子！

后来听说，王老师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就自动离职回湖南老家去了。从此以后再没有听到她的下落。一个年轻有为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这样葬送了一生！

王老师为什么打成右派？据说与“凑数”有关。因为生物系老师在鸣放中没有抓出一个右派，通不过审查，祸事就落在了王老师头上。共产党要整人，谁都跑不脱的。

其实生物系有一个“大家火”，只不过是“死老虎”。那就是原来的系主任施伯南先生。这个中国首屈一指、蜚声中外的鱼类学家、著述等身的学者、科学巨著《中国鱼类》的主编，早在我入学前的 1955 年，卖国贼们就给他强加了一个罪名：反苏，而撤销系主任职务，还取消了上课资格，在实验室当实验员。一个顶尖级的科学家落得如此下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事情还要回溯到中国人被“解放”的初期，那些甘当苏联走狗的卖国贼们，把那些水准低劣的苏联人请进来当成祖先供奉；学富五车的施先生怎能容忍趾高气扬颐指气使而又不学无术的外国人指手划脚！当他用不可辩驳的事实指出苏联人的无知无能而使老大哥面无光彩时，我们那些俄国人豢养的共产革命鹰犬们，非但不为民族争光，反而和帝国主义分子一起迫害施先生——这个具有鲜明民族气节的科学家。从此以后直到文革施先生被迫害致死，没上过一节课。

### “丰衣足食”

那怕是脱胎换骨，吃饭也是头等大事。

金刚乡是北碚区、重庆市、四川省和全国先进单位。乡长兼社长的张莉容，也是区、市、省、全国劳动模范和人大代表。因此金刚乡就有许多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丽神话，如人人丰衣足食，家家住瓦房，户户用自来水……

如果你信以为真，那就错了。

第一天和社员一起劳动，就听两个社员在打赌，一个说他一顿可以吃 5 斤面条，一个保



证一顿吃下两斤宝肋肉。后来我发现，社员们经常话不离口的，就是一个字：吃！不管上班、休息、乘凉，也不管男女老少，都谈论这个事情。除了打赌，他们还经常打“精神牙祭”，诉说曾经享受过或看见过的盛宴美餐。吃，是社员谈论的“永恒主题”。

为什么大家对吃如此有兴趣？答案是：饥饿。

来到房东王大爷家，才体会到“丰衣足食”的滋味。

其时正是胡豆收获的季节，一日三餐桌子上都是一碗麻渍胡豆和一盆清稀饭，外加一碗泡酸菜，没有一滴油浑。稀饭清得照得见人影，如果把肚子胀饱，绝不会吃到一两米。麻渍胡豆是把胡豆在锅里爆炒后加水煮一煮，然后和胡豆壳一起嚼碎吞下。如果不细细嚼碎，那就不能消化整天放屁。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二十多天。胡豆吃完以后就吃洋芋、包谷。在房东家搭伙几个月，没有吃过一次肉。不是房东刻薄，确实没有。

但是王大爷还是本组社员中最“富裕”的。后来成立公共食堂的时候，挨家挨户搜查粮食，全组 17 户 70 多个社员一共才搜出 300 多斤粮食，王大爷家就搜出 200 斤，是“首富”。还有 6、7 户竟然一粒粮食都没有，以菜充饥！

后来我才知道，每个社员全年分得的粮食，包括稻谷、红苕、洋芋、小麦、包谷、胡豆、豌豆等，不过四百多斤原粮，其余全部被国家拿走。如果换算成商品粮，每天只有七、八两。这样的标准对于缺油少浑的重体力劳动者，就只能挨饿。

他们的饮食习惯也特别。为了节约柴火和时间，常常煮一顿吃一天。那存放到第二顿或第三顿的清稀饭，就被微生物发酵分解成带馊臭味的汤水，真是难于下咽。可是有什么法？农民都吃我敢不吃！现代人都喜欢发酵食品，早在 50 多年前我就饱餐了。

虽然伙食很差，但有一次全组人竟然都吃“蛋花汤”。

金刚乡户户用自来水，原来是用打通了节疤的竹管，把田里的水接到水缸里。这样的“发明创造”古以有之，却拿来当成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成就，真是拿原始人的屁股当自己的脸。有一次给稻秧施肥，泼了许多人粪，那像蛋花一样的新鲜大便就随着竹管流到家家户户的水缸里，然后用来煮饭，也就人人都吃“蛋花汤”——异香满嘴，咽而逆呕。脱胎换骨的生活，原来如此“丰富多彩”。

### **“战斗的夜晚”**

“脱胎换骨”的第二个问题是睡觉。

金刚乡“消灭草房”的办法，是把所有草房捣毁，把农民赶到剩下的几间瓦房去住。以我所在的官家黄葛树为例，这个由大小两个相联的三合院组成的院子，总面积不过 400 平方米。“解放”前住一户地主和两户佃客。土改时消灭了地主肉体赶走了他的家人，搬来 5 户农民。消灭草房后，住进 17 户 70 多口人，拥挤狭窄可想而知。有的一家人住一间屋子，锅灶安在阶沿上，厕所设在后阳沟。而那个公共的院坝，则是每家每户堆放柴草杂物，以及猪狗鸡鸭出没的地方。因为搞人畜粪分坑，17 户人家，竟有三十来个粪坑。这种环境条件，肯定是蚊蝇的共产主义天堂。气味难闻不说，苍蝇追着你飞也不说，晚上蚊子肆无忌惮地叮咬，逼着你不得不自卫反击通宵“战斗”。

太阳一下山，这些吸血鬼就从四面八方飞了出来，乱飞乱撞，就像一群轰炸机在寻找目

标，那嗡嗡的叫声震耳欲聋。这个时候走进屋里，就有无数的“飞机”撞你的脸，如果一挥手，一定会击落击伤“敌机”好几架；有的“飞机”干脆降落在你的皮肤上迫不及待地刺穿你的血管……

在这样的夜晚睡觉，如果没有蚊帐是何种感受？

在黑暗中我只能脱下衣服包住头、脸，留下鼻孔出气，身体则缩到被盖里。但是蚊子是与炎热伴随的，不久就大汗淋漓，不得已甩开衣服被盖。而蚊子也就乘虚而入，叮满裸露出的皮肤。你只能挥动衣服一阵驱赶，当你驱赶累了一旦停下来，蚊子也就卷土重来；于是不得不又包头盖身，大汗淋漓，然后又掀开被盖，然后又挥衣驱蚊……反复几次之后，本来就劳累一天困盹不堪的身体，只有举手投降放弃抵抗，迷迷糊糊像死猪一样任凭吸血鬼们恣意叮咬。当你在睡梦中觉得皮肤恶痒恶痛下意识一巴掌，立刻感觉手心粘糊糊的，那是你的鲜血已经变成蚊子的身体又被压碎所致。第二天早晨起床，你会发现，脸上、手臂上、手心里，全是已经变成紫黑色的血锅巴。而墙壁上，那些胀饱了飞不动的蚊子，它们的肚子，一个个红亮红亮的。我的鲜血，变成了它腹中的美餐。

夜夜如此！夜晚，对于没有蚊帐的我，是地狱般的恐惧。

## 房 东

终于没有出现离校时王副院长吓唬我们的那种情况，贫下中农没有用拳头和扁担教育我们。相反，他们对我们这些落难的右派学生还比较宽容。那时中国人被“解放”才八、九年，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还没有被共产革命彻底摧毁，农民还没有被教唆得很坏，还保留了一些善良与宽厚。

房东王大爷和王大娘都是 50 开外的人，两个儿子已经另立门户，和小女住在一起。他们诚实善良，对我这个外乡到来的陌生罪人没有另眼相待，人前人后从没叫过我一声右派，都称我是“下放的”；他们也知道我出身地主家庭，但从来也没有表示过对地主及“狗崽子”的仇恨。在政治上，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另类”。生活虽然很差，但从没挨饿，特别感谢王大娘，总是对我说，年轻人，多吃些。后来成立公共食堂，打回来的饭菜还是和我一起吃，他们把我看成一家人。有一次我把王大娘养的一窝小鸡踩死了一只，大爷大娘从表情到语言都没有一丝责备，至今令我十分愧疚。

王大爷家还住着一位鳏夫老易，是王大娘的大哥，单独住一间屋子，与王家同灶同锅但是分开煮饭。每天夜饭之后，老易和王大爷就含着叶子烟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下漫不经心地摆龙门阵。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王大爷过去是给一位地主兼煤矿老板的罗大爷抬轿的轿夫，王大娘则带着孩子在家种地。老易是一个小作坊做挂面的工人，后来作坊被没收了，他才回乡务农。按理他们都是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应该仇恨“旧社会”以及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主狗崽子和右派分子。可是恰恰相反，虽然罗老板后来被枪毙了，但王大爷对他没有一丝恶感，还称赞他对人很好，很善良，从没亏待过他，支付的工钱比种地所得多得多。我隐隐感到，王大爷对我的善良，恐怕有罗老板的影响。老易则说他的资本家老板待人平等，从没训斥过他们。他们十分留恋过去那种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的美好生活。王大爷说：“只要抬罗大爷出差，那回锅肉尽你吃够。”老易则说：“那鸡蛋挂面由

你吃，油辣子由你放；就是捡面节节吃，也比现在吃得好。”在他们的谈话中，“解放前”并不是受剥削受压迫，而是美好的日子。如果他们的话从我嘴里说出去，肯定右派还要升级。

为什么王大爷他们对“解放前”如此留恋？是因为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太不得人心。大救星没有救民于水火，反而是灾难的制造者。

### “看关地”

和农民一同生活，有一道特别的风景，那就是可以随地撒尿。薅包谷的时候，薅着薅着，你忽然听到像水龙头拧开了一样的哗哗声，那是男社员在撒尿，尽管他的旁边就有女社员。一道出工，他转过身去，解开裤子就“放水”，尽管他身后就有女社员经过。他们的逻辑是“屙尿莫看人，看人搞不成”。对来自校园的我，感觉实在不雅。女社员们没有那么随便，她们到工间休息的时候才急急忙忙回家上厕所。

有一次我拉肚子，工间休息的时候才跑回家去方便，然后再到工地。谁知走到途中又有便意，我又折回去。这样就耽误了时间。队长很不高兴地问我：“到哪去了？”

我说：“上厕所。”

“你又不是婆娘！”他大声训斥我。社员们一阵哄笑。

我说：“解大便。”

“屙把屎要跑那鸡巴远？看关地不就行了！”

什么“看关地”？我简直懵了，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看见我那痴呆窘态狼狈不堪的样子，男女社员一阵狂笑……这是我下乡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受到训斥和嘲笑。

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看关地”。是“看一关地”的意思。原来阴阳先生给人看墓地的時候，是把罗盘放在地上，然后蹲下来观测风水，其状如解大便一样。农民老大哥就把在野外随地大便，形象化为“看地”。

毛泽东说，和工农群众比较起来，知识分子是比较地无知识的。我信乎也哉！

但是这样的事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吗？我也要随地便溺吗？我也要吃“蛋花汤”、吃“发酵食品”吗？我也要漱口水不洗澡吗？我也要像他（她）们一样为了丁点小事争吵不休粗口骂人吗？……

农民虽有勤劳朴实的优点，但是无知、愚昧、落后、保守这些与生俱来的远离现代文明的缺点，那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如果全国的知识分子，全国人民都学习贫下中农，都成了贫下中农，那中国像什么样子？恐怕离共产主义——加上“原始”二字——就不远了。

“向贫下中农学习”，是一个逆社会文明潮流而动的反动口号。

下乡以来，我是真心脱胎换骨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但是学什么？我找不到答案。

有人说学习贫下中农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品质。但你如果深入他们内心，你会发现并非如此。社会主义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温饱的基本条件，他们凭什么热爱你？农业合作化、防止什么并不存在的“两极分化”、把农民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都当成资本主义来打击，迫使农民长久生活在贫穷落后之中，他们会真心热爱你？任何执政党，都没有天然的执政合法性，全靠你的政策能否取悦于人民。如果残民以逞又要老百姓山呼万岁，只能是枪杆子的功劳。这样的政权，就是暴政；其党魁，一定是暴君！

##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但是，使农民更加苦难的日子马上就到来了。那就是：建立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

大约是7月20号晚饭后，全组社员集中在院坝开会。先由下放干部唐中富讲话，他说：“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提倡的新生事物，是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大门，大家现在已经在共产主义天堂的门口了，是进去还是不去，这是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区别；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区别。我们要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必须大办公共食堂……”唐中富才从乡里开会回来，他是按乡里的布署办事的。

唐中富命我作记录，我坐在小油灯前等待大家发言。几天前大家就议论这件事，都嘀咕着不愿意参加，因此会开得很沉闷，没有人发言。黑暗中我无法看清大家的表情，只听得滋滋的抽烟声和拍打蚊子的扑扑声。我想此刻，每个社员的内心一定斗争得很厉害，如果实话实说，肯定是不行的，那是反对毛主席，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不戴“帽子”也要遭“辩论”；眼前这个作记录的小伙子不就是嘴巴不乖遭了的？如果说愿意，那是骗人又骗己。所以大家只能沉默。

如果说公共食堂是一座巨大的坟墓，是两年后大规模饿死人的直接原因，那末现在他们正走在地狱门口。谁愿意进地狱？会场一片死寂。

唐中富再三启发：“大家表态嘛，不表态是不行的啊。”

后来一位寡妇（忘了名字）打破了沉默，她说自己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艰难，“愿意加入公共食堂，有饭大家吃，过共产主义……”

带头羊过了河大家也无可奈何地跟着过河。我就全部记“同意”，轻松地完成了记录任务。于是公共食堂就成了“老百姓‘自愿’办起来的”了。后来听说一些地方，社员还“自觉自愿”写申请书签字画押，生怕不能到天堂里去饥饿等死。

猫儿本来不吃辣椒，传说毛泽东有一个方法：把辣椒抹在猫儿的肛门上，辣得它疼痛难忍，不得不用舌头去舔肛门，就把辣椒“自觉自愿”地吃下去了。

不管这个传说是否真实，但是毛泽东将其恶政强加于百姓，迫使百姓不得不“自觉自愿”地产生“内需”，再冠以“尊民意顺民心”的美名推行其倒行逆施，则是他牧民术的特点。统购粮食、合作化、公社化、思想改造……莫不如此。

大家表态后扯了一些具体问题，生产队长宣布明天开始建造大灶，三天后取消小灶集体开伙；粮食、生猪、自留地一律收归集体。

会议即将结束，一个叫官二爷老头大声说：“把粮食、生猪、自留地都没收了，要是患病吃药需要钱哪个办？”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都不由得一楞，又是一阵沉默。

唐中富说：“哎呀！你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的。进入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你还怕没有药吃？吃鹿茸人参都由你。”唐中富是西师教育系职员，他未必能应对如此尖锐的问题。他的回答大概是乡里开会时拟好了的。

一个社员也大声说：“要是男人们都吃鹿茸人参，那婆娘们怎么遭得住？”

他对共产主义神话的反问引来一阵笑骂。于是，大家在哄笑声中一不留神就跑进了共产主义。

## 最后三天资本主义

第二天生产队长便带领民兵翻箱倒柜挨家搜缴粮食，登记生猪，查看自留地，不许再采摘。几年前收拾地主的办法现在轮到了他们。

生产队长叫我称猪，即跳进猪圈把猪捆好过秤。由是我得以跟随搜家队检阅所有社员家庭。经过半天搜查，共搜得稻谷 300 多斤，玉米 100 多斤，胡豆几十斤，全组 17 户 70 多人就这点口粮！这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太可怜了。存粮最多的就是我的房东王大爷家，有 200 斤稻谷，官五爷家有稻谷和玉米近百斤，许多户只有几天存粮，还有五六户，包括那第一个报名参加公共食堂的寡妇在内，一粒粮食也没有，以菜充饥。在如此穷困、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过渡到共产主义，真是异想天开！除了政治诈骗和暴力驱赶，还能说什么？

经过没收后剩下一点可怜的物资，在进入共产主义前的三天，必须迅速作出处理，于是该吃的吃，该卖的卖；一会杀鸡杀鸭，一会上街买卖，上班钟都敲烂了也未见谁出工，他们对于即将来到的共产主义生活，充满了疑虑、迷茫和惊恐。

我的房东王大爷家损失最惨重，一年到头勒紧裤腰带节省下来的两百多斤黄谷眼睁睁被没收，两头肥猪早该交售，为了长大一些多卖点钱，也被没收。王大娘最气愤，穿没穿，吃没吃，整日劳累换来一场空。“我说把猪卖了，你不；我说把谷子打米吃，你不，现在安逸了！”王大爷只有耷拉着脑袋任她埋怨。后来他终于作出决定：五只鸡卖四只吃一只；两块腊肉一块给儿子儿媳一块自己吃；米缸中的米全部吃完；自留地里的辣椒、豇豆、茄子或吃或卖，不管生产队如何规定，全部摘尽……

过完三天“资本主义生活”，这些由贫穷变为赤贫的社员就到共产主义天堂去过“幸福生活”了。

### “天堂”记实

公共食堂禁止私人开伙，改变了几千来的传统习惯，每个社员都惶恐不安一时难于适应。食堂开伙的第一天早晨，广播声响了又响，却无人上班，矜持稳重的男人们心事重重地坐在阶沿上抽烟，妇女儿童则拿了缸缸钵钵涌进食堂打饭：每人三勺清稀饭，由 1 两米加 1 斤水的比例煮成，再加一箸绝无一滴油浑的凉拌藤藤菜。饭打回来后王大爷直摇头，王大娘抓了一些仅存泡酸菜勉强对付。这是天堂里的第一顿早餐，我记得十分清楚。中午晚上都是三两米做成的干饭，仍旧一箸藤藤菜。因为早餐时谁舀清了谁舀干了大家争吵不休，中午就用秤称给大家以示公平。但是那三两米饭无论如何是填不饱肚皮的。以前各家开伙，吃干吃稀，菜菜梗梗，总要把肚皮胀饱。现在每顿二两或三两，一箸小菜无油无浑，一口吞下，腹中空空，整天饥饿。报上天天叫喊“鼓足干劲生产，敞开肚皮吃饭”，大救星也在研究“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捏着鼻子哄眼睛”。所以从公共食堂成立那天起，就是饥饿，饥饿，无穷的饥饿！这样拖下去肥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一二年后，饿殍盈野，就不足为怪了。

几天以后，从社员家收来的粮食吃完了，就吃才收获的包谷。但是没有大磨磨面，只好把包谷爆炒后用水煮胀，或者把炒熟的干包谷分给大家。这种革命化的饮食谁的肠胃也没法承受，王大娘就把分来的包谷用石磨推细后加些野菜煮成糊糊。各家也都如此，与每户开伙

有何不同？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但是大救星要折腾百姓谁敢说不？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本来就是荒唐，成立人民公社是更大的荒唐，建立公共食堂则是极端的荒唐！

但是这种把打回来的饭再煮一次的办法到九月份以后，强令各家砸锅献铁支援大炼钢铁，就无法再煮了。有个别胆大的社员交了大锅私藏小锅，晚上偷偷煮吃的，干部看见屋顶冒烟，便破门而入将锅里的东西泼在地上抢走小锅，或将锅砸烂！所以三年后公共食堂“光荣地完成革命任务”时，许多农户竟没有铁锅煮饭，不得不用瓦罐代锅，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只不过仍然要加上“原始”二字。

公共食堂开伙五六天以后许多小孩就经受不住了，就悄悄地到地里偷包谷在僻静处烧来吃。后来瘟疫般漫延传染，59年以后几乎人人偷吃，凡可吃的都偷，来势凶猛不可阻挡，任何伦理道德也无济于事。毕竟“衣食足则知礼节，仓廩实则知荣辱”，大救星一直强调思想先行，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但事实跟他开了个大玩笑。

公共食堂从成立那天起就纷争不断。因为物质匮乏人人饥饿，常常为争夺丁点生存资源而争吵不休。例如打饭时我站队你插轮子，我打少了你打多了，我舀稀的他舀干的等等；打回来的饭菜家人分食，又少不了内斗。斗争哲学已深入到每个家庭。不是大家的道德沦丧，而是大救星将人逼到死亡的边缘，伦理道德只能让位于生存斗争。而干部们则利用职权多吃多占，吃喝偷拿。我仅在公共食堂呆了十多天，但这种现象已初见端倪。

传统的农村，是鸡犬之声相闻。可是成立公共食堂以后，不闻鸡叫闻猪叫。生猪归了集体不准私人喂养，生产队虽然派人专门养猪，可拿什么喂？人都没吃的还顾得上猪大爷？所以猪们饿得只能用嗓子表示抗议。鸡公早为主人作了贡献，不再唱男高音了。暂时还有狗叫，几个月后狗也被人果腹；再后来，猪也死光吃光。于是广袤的农村不闻鸡鸣、狗吠、猪叫，静如远古洪荒，绝无噪声污染。

公共食堂的“新气象”还很多，只是我体会不深。因为公共食堂成立不久，我就和我的同类一起抽调去修公路，修养猪场，修高炉大炼钢铁，离开了生产队。

### 颠沛流离

大约8月上旬，我就和胡光伟、张福泽以及数学系、教育系的一些右派同学从生产队调出来，成为公社直接支配的劳动别动队。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我们就被公社公有了。

那是一段居无定所，食无定处的日子。其时，正是重庆最酷热的时候。在40度高温之下，我们没有任何防护设施，光头，赤脚，赤裸上身，穿一条遮羞的内裤，在烈日的曝晒下，拿着锄头、钢钎、抬杠，一会儿修公路，一会儿修养猪场，一会儿修高炉，一会儿炼钢、抬石头、挖地基、运木料……辗转流徙。我们的皮肤晒得比农民灶房里薰的腊肉还黑，体内的水分也几乎晒干了，神情憔悴，面容枯槁，一身疲惫。那是一段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和劳改犯没有两样。

记忆最深刻的是修养猪场抬石头，400多斤的连二石两个人抬着，在烈日下，在高低不平的碎石路上，赤足行走，那是怎样一种煎熬！上缙云山运木料，扛着100多斤重，4、5米长的木料，在陡峭曲折的林中穿行，不时撞在岩石上、弯拐上，很难保持平衡，稍不注意就会摔跤，那100多斤压在身上，时时都有粉身碎骨的危险！有时树木太粗，需要两人共抬，

但危险性更大。因为在陡峭弯曲、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行走，很难做到步调一致；尤其是下陡坡的时候，大部分重量往往压到前一人身上，一旦超过负荷后果十分严重。验收木料的是一个高瘦黑黝的老头，我知道他是历史系的右派讲师马益，他看见我们如此艰巨的劳动，不无担心地提醒我们注意安全。可惜这位善良的长辈不久就被折磨死了。修公路打炮眼装火药点引线，炸得碎石满天飞，如果那碎石一旦落在头上，脑壳上的“沙罐”一定会“开花”；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我们只得双手支起一个撮箕罩在头上，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后来到北温泉回首一公里处的重庆 22 中侧边修土高炉炼钢，一千多人困聚在一起，安上多个百瓦大灯泡日夜奋战，就更顾不得身体了，做牛做马也没有这样劳累。

那时我的全部所有就是一条换洗的内裤、一根洗脸、洗澡、擦汗兼用的毛巾、一床破草席、一个碗、一双筷！下班了，去水沟里浇水擦一擦身体；口渴了，去井边捧水喝；吃饭了，拿着碗筷去食堂打饭；睡觉了，没有床铺，没有垫草，没有枕头，更没有蚊帐，把破席子往泥地上一铺，疲惫不堪的身体躺下就睡，也不管蚊虫叮咬，实在太累了。只有此时才感觉身体属于自己的，才能按自己的意志平躺、侧卧、休息。一旦早晨 5 点半钟广播声响，就身不由己地立即起床，我们又像牛马一样被驱赶着做自己最不愿意做的工作……

我们的住处先被安排在公社办公处侧边的一间屋子，但常常被人挤占不得不经常搬迁。往往睡觉的时候还不知今夜躺在何处。修高炉的时候二千人挤在 22 中狭小的校舍里根本无法安排睡觉，教室、走廊、礼堂、操场，自己找个地方横七竖八地躺下；那个样子很像战场上击毙的尸体……

那时都是公共食堂，吃饭就临时指定，往往早饭在一个地方，中午却在几百公尺或者一两里外的另一食堂。每餐一小罐饭三两米，一箸菜，有盐味但绝无一滴油浑。

这样的日子我们从 8 月上旬到 9 月 26 号一干就是 50 多天。如果继续下去，不知是一种什么结果。

### **逃离苦海**

8 月 27 日早饭后正拿着锄头去修高炉，公社广播站忽然通知：“西师来我社劳动改造的右派学生注意：你们于今天之内带好行李回学校生产部报到；右派教职工继续在原岗位劳动，不得擅离职守。”

我们得知后暗暗高兴，都知道现在的处境是无边的苦难，继续下去，肯定死路一条。如果说西南师范学院对我们这批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还多少做了一点好事的话，那就是在这个极端苦难的时候使我们脱离了苦海，避免了伤亡。不然继续在农村里的公共食堂呆下去，不知有多少人要被饿死。虽然回到学校同样是做苦工，同样是任人践踏的右派分子，同样是残害我们的身体又强奸我们的意志，但是毕竟生活要安定得多，正常得多。

我们马上丢下锄头，回各自的房东家收拾好行李，当日下午，就回西南师范学院勤工俭学生产指挥部（简称生产部）报到，离开了这个我们一生之中最为苦难屈辱的地方。这是 1958 年 9 月 27 日。我们在重庆市北碚区金刚乡“脱胎换骨”5 个月另 11 天。

再见了，花灯生产队！再见了房东王大爷！虽然你们对我还算宽容友好，没有用对付阶级敌人的手段对待我，但毕竟是共产党强加给我的屈辱和苦难，深深地伤害了我的肉体和精神。

神，使我不愿意触及这段痛心的往事而再见到你们。

从此，又开始了另一个我们一生中同样苦难屈辱的劳动改造生涯。

## 临界地狱与天堂之前的呐喊

### 它 山

我回城治病，胡珂和她的大姐胡甫琳来看我，后面跟着一位仪表堂堂的男士。

她大姐在长寿湖与我是难友，无须介绍。只介绍后面的男士给我：“这是程敦荣，大姐的新任丈夫。重庆科技情报所的翻译。”胡甫琳紧接着加上：“同案犯，老右。”

我与他点头、握手。他文质彬彬，讪然一笑。从此，我们相识了

#### (一)

74年我调回重庆，被文不对题地安排在一个剧场写戏牌子。离婚后的我，孑然一身，住在剧场附近的一个2.5平方米的阁楼上。

从改造营地回来，在有几十万城市人口的喧嚣嘈杂里，我感到的是冷漠与孤寂。老程和我这样的人，尽管是单位上的工作需要，领导偏要说是为了锻炼革命群众的革命斗志需要一个反面教员云云。因此在单位里，我们是“鹤立鸡群”的分子。特别是在下班后的那份走投无路的孤独感，使我与老程走得很近，他常来看我。

他的夫人胡甫琳是从长寿湖遣返回家自谋生路的右派，街革委和派出所没有给她安排一个维持起码生活的工作，只有打扫公厕和批斗会场等等惩罚性的义务劳动。虽然在这座城市里她的亲戚朋友很多，但她很硬气，要自食其力，成天忙于生计，给人挑煤送水，倒罐子。要赶在早晚收粪车到达之前，把人家屙得满满急需倒掉的屎尿罐子提到街边排队等候，倒完清洗干净再分别送回各家各户，每个罐子可以收到3至5分钱。往往在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家。

尽管程和她结婚后，劝止她不要继续干那些低贱粗活，凭老程降了级的工资也能养活她，但她几乎是愤怒地拒绝了。她说：“你以为跟你结婚就是想要你养活我吗！？”老程从此不敢再提。每天从情报所下班，不从捍卫路直上七星岗回家，偏要走临江门。先站在对面街边打望我的阁楼小窗，只要小木门向外开着的，他就上来。聊到九、十点钟，他才慢慢回家去吃晚饭。

我们每次见面，没有事前准备的话题，往往是无从说起而说起。包括见闻、牢骚、释疑和相互抚慰等，无话不谈。在单位上憋闷了一天或几天，只想跟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张张嘴，叹口气，那怕说一句今天天气好的废话。或相对无言地听听对方的心跳或呼吸声，都是相见的理由，也是我们相互期待的时刻。

从无到有，从沉默到热烈。断断续续的闲扯中，慢慢得知他是湖北武昌人，说话却没有一点湖北尾音，纯正的普通话。抗日救亡的高潮中，他毅然投笔从戎。从陆军进入空军，是中国空军首批赴美受训学成归国，选入美军14航空大队(前身即飞虎队)，与盟军并肩作战的



驱逐机飞行员。

42至43年在祖国的上空与日本零式战机交锋，阻击日机的轰炸，多次击落日机。击毁过日本在华机场、桥梁、高射炮阵地。袭击过敌军舰、运兵车、战壕。并执行保护驼峰航线畅通的任务，随时升空驱赶日机的冒犯干扰等等。战绩卓著，由陈纳德将军提议，获得中美双方各自颁发的奖励和勋章。

他知识广泛，幽默风趣的谈吐，常常使时间过得很快。他走后，我独坐阁楼。

想自己的当年，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只会在黑板上画架飞机去丢炸弹，炸得日本鬼子四脚朝天的玩艺儿。怎能像他开飞机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干过？想起重庆人发明的“轰炸东京”（油炸锅巴趁热盖浇滑肉片，发出焦炸爆脆的声响）的抗日名菜，以及演活报剧，站在一只洗脚的木盆子里，要跨越大海“打到东京去”等等，暗自好笑。

在我心目中，他陡然高大。似乎是在重新点燃我少年时代那股爱国和崇敬英雄的激情，令我肃然起敬的老大哥，让我神思默想的英雄。现而今，他却与我是“同案犯”？与我促膝聊天，实在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甚至胡思乱想起来是不是有个现代秦桧的存在？历史在重复着迫害精忠报国的岳飞？

他是个身材魁梧的汉子，喜欢戴一顶白色草编凉帽。从底楼的小门进来时，总是先摘帽，后躬腰低头，然后挤进门框，那十分尴尬可笑心酸的样子，至今难忘。再经窄窄的楼梯爬上令人提心吊胆的三层危楼，每次的到来都让他十分委屈又冒险，我实在过意不去。何况我的对门是个才艺不高却擅监视的女演员。因此我提议，请他不要来。我一定按时去他家继续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会餐。

## （二）

以老重庆的自信直奔七星岗，转进保节院小街。按他留的示意图，我傻眼了。

一坡杂乱无章低矮木结构房屋，层叠在一脊山梁上，上窜下跳的石梯坎更让我迷茫。穿来穿去，穿到顶，只见在四周种有葱蒜苗零落的几家棚户，找不到XX号附几号的门牌。忍不住向一位老大爷打听，他端详了我一阵，才把嘴往高处一撇，“那一对老右？”

坡顶尽头，一个孤单的窝棚兀立在落日余晖暮霭阑珊之中。有本书叫《山坳上的中国》，这个书名常让我再想起那个景象，一幅孤寂无奈又挺拔的印象派力作。

这是城市发展残留下的一块还有少许菜畦田土的地方，周边是鳞次栉比的房舍。那个窝棚，原本是坡顶上的粪池，利用其上的大半幅面积搭起猪圈牛栏之类的房舍。究竟先有圈还是后有房，无法考证。牛毛毡屋顶上铺了一层稻草，长出了依稀可见的野草野花。

以文革中关押牛鬼蛇神的种种‘牛棚’而言，都仅仅是一个设定的名称，或许是高堂华屋里的一间禁闭室，或是单位上年久失修的旧屋僻舍，总之是人住的房子。这里却是名负其实的“牛棚”，只不过这是他俩自觉自愿到此过日子的“窝”。

当我还在打望思索中，老程已系上围腰正在屋后的灶台上准备晚餐。看到我立即招呼进屋，自我解嘲地说：“里面，别有洞天”。

有门无窗的屋内被旧报纸裱糊得干净利落。进门对面是床，靠床头一张方桌上堆满报章杂志书籍。篋笆壁上照样供奉着毛主席，画像对壁挂二人的结婚照，说这是天天向毛老人家

请罪的位子。一盏电线很长可移动的电灯，根据需要可随时用于吃饭看书，或是牵到屋外做饭。

从结婚照说起，我便探问他俩是怎样鬼使神差走到一起来，喜结良缘的？

老程原本是北京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室副主任，打成右派后下放到重庆。文革之初地段上也要紧跟形势，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把他从情报所借出来，又把胡甫琳从地段上抓出来一齐押到一号桥的桥头，组织群众批斗。59年城市清遣五类分子赶出市区之后，这里只剩下这两个阶级敌人了。把他俩推推搡搡押上桥头石栏杆的石磴上罚站，左右各站一个。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妇女和老弱病残的辱骂和参差不齐的口号声中，低头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阶级斗争，革他两个阶级敌人的命。

革命群众革命革累了，正午的太阳晒得革命群众各自阴一个阳一个纷纷梭去。但他俩必须站在石磴上继续低头认罪，接受过往行人观看示众，昭告世人这里正在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俩趁人稀少之际，偷偷抬头互相打望一下，瞟上一眼，以至于“眉来眼去”。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眼神，温情脉脉地互相鼓励着坚持，挺住，再挺住！经过多次召之即来的批斗，把他二人斗成了暗暗思念着的恋人，盼望下一次批斗的当代版“鹊桥会”快些到来。

后来水到渠成，他俩去街革委办结婚登记。办事员按照条款款，先要严肃认真审询恋爱经过，是不是有爱情的基础，以及经何人介绍？等等，老程一时难于开口。

“我就对他们说，感谢各位领导，是你们介绍的。”不知何时胡甫琳突然回来了，汗流浹背站在门口，摇起围腰裙打扇，大声武气作补充。

胡大姐是热心快肠的人。重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初的重庆市副市长胡子昂先生的嫡亲长侄女，排行老大。自幼受家族中爱国民主精神的熏陶，在学校里是宣传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共产党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以建立联合政府等等为号召，赢得民心，受到百姓拥戴。当时她与重庆著名的大律师张冕已结为夫妇，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49年春民盟从渣滓洞白公馆保释营救出了一批盟员(包括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她是参与者，并用私人的积蓄，在经济上积极救助革命同志支持革命活动。当时出狱的同志都由她发给生活费，以及生活用品，还支援过许多人逃离山城转移到外地去了。

1957年毛泽东、民盟都在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她素来口直心快，加之前夫张冕为原重庆市参议员，也是拥护共产党的爱国人士，但新政无以容纳，长期监管，50年代中两次被捕而瘦死狱中，这已是在劫难逃。她是地理老师，在讲课时离开教本讲到外蒙古独立，说中国版图从海棠叶子变成了像只鸡，就这个“罪状”被划为右派。在劳改中她风风火火的性格，令人印象深刻。我曾开玩笑建议她改写成“胡虎琳”，“虎”死不倒威嘛。从劳改到遣散回家来，她总是昂首挺胸，一如既往如此做人。

这时，我对老程这个飞行员怎么又成了科技情报的翻译？更感兴趣。

他迟疑犹豫着“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样子，胡甫琳插上了话：“有啥子不好意思说的？那是共产党没良心嘛！给他提点意见就成了动摇分子、右派分子，我说你是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分子。只可惜，老程，枉自一腔爱国热忱，却“爱”进了毛泽东的‘阳谋’”。

她激动的言词，在当时还让我有些紧张。但是，她随即提起胡珂讲的，老舍的话剧《茶馆》里有个常四爷，他有一句台词：“我爱我的国呀，可谁来爱我呢？”似在总结自己和老程的景况，也是在自我调侃感叹：有谁爱我们呵？

1945年后，老程跟随恩师（飞行教官赖明汤，后任台湾空军参谋总长），赴中华民国驻伦敦大使馆任武官助理。1949年春，大使馆突然接到南京政府一道密杀令。指示立即查办空军武官助理程敦荣，罪名是侮辱领袖，批评政府，通共反战云云。

老程说，

——其实我并没有骂过蒋介石，至于说反战倒是真的。说过一些不该打内战，中国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中国要强大，必须走自由民主的道路。当时我受到一位同乡，留英学生(后在北京外交部工作)的影响，共产党的主张和宣传口号，正是我心里想过又无法表达出的东西。觉得中国的希望和未来，都只有共产党才能担当实现。

何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共内战中，我支持正义，反对邪恶。把我看到的一则内部“匪情通报”泄漏给那个同学，他立即传报给国内的共产党。挽救了几个打进国民党心脏里的共产党人，逃离虎口。这才是我的真正罪过。

在恩师的关照下我逃离伦敦，绕道香港，躲在老家乡下。49年7月转到北京参加革命，后来就在情报所工作。当时，驻英大使馆向南京政府回电：“武官助理程敦荣失踪，去向不明。”

就这样，我满腔热情地投入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中，忘我的工作。后来共产党号召整风，毛泽东四处游说。我真觉得他了不起，是几千年来空前的明君。我不能对祖国的建设袖手旁观，对一些缺陷坐视不管。我提过一些建议，根本说不上是什么指责性的意见，却把我划成了右派。

我从心里热爱这个新中国。这不，最终跟我的老婆子有缘份，都爱这个“国”嘛，爱到一起来了。结婚后，我从情报所单身宿舍搬到这里，也不需要哪个来爱，我们相爱着哩。——

晚饭做好了，请我入座，我拒绝。口粮有定量，岂能多占。这时回来一位年青小伙，是老程去世的前妻所生，不久前从湖北老家来，在重庆铅笔厂做临时工，说是比乡下的日子好过多了。这时我才发现门背后还有一架可折叠的行军床。

临别，我同意小伙子送到大街上去，以免迷失在这个灯火迷乱的山梁上。的确，经他带路几下几穿就回到了七星岗大街。

那时大街上的照明，相距30多公尺才有一盏悬挂在街心顶上的白炽灯。整条大街亮一阵，暗一阵，晕一阵。漫步在忽暗忽明之中，回味着这对爱国者爱到一起的奇缘，我也在思索自己，爱国与个人之间诡异莫测的宿命联系。从保家卫国，帮党整风，一路走来。我是那个单位里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当中，最年轻处罚最重的一个。

### （三）

后来，我去过多次。

从文革后期至偃旗息鼓，我们共同经历过风云幻变令人心惊胆颤的时刻，也分享过荒唐可笑的趣闻轶事。有个马屁精医生说毛泽东要活一百五十岁，我们半信半疑，忧心忡忡。他

活那么长，我们还能活吗？直到四人帮被审判，江青说她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等等。

这时已对右派问题作出不是平反而是“改正”的决定，尽管这种言不由衷的处理，是死不认账自欺欺人的无赖表现。但是对我们三个同案犯而言，总算是一个痛苦缠身的人生梦魇的结束。似乎在伸伸懒腰，舒展筋骨的轧轧声里，我们油然而生要找回失去的青春与时间的冲动，大有髀肉复生之感。

81年，胡甫琳被召回学校教地理，找我给她画一张只有轮廓线凹下去一块像只鸡的地图，以便上课。老程每天精神抖擞去上班，甚至晚上还要去加班。我调去国画院，也是忘乎所以地在工作。聚会慢慢稀少，以至几乎忘记了。

直至北京“六四”屠杀的枪声震撼了世界。在这低徊哀痛的时刻，我下意识地想起了老程与胡大姐。急不可待地找到他俩的新家，情报所分给的一室一厅的住房。

得知老程在重庆，正在单位上办公室里默默奉献，心中释然。这些年来，他废寝忘食地工作。重庆建第一座长江大桥，是由他译出厚厚的外文资料和一些洋设备的说明书，施工细则。特别是在什么沉箱下桩时，他亲临工地去解释操作规程与方法。为重庆军工产品中译英几百万字，以及重庆搞四省五方介绍，“锦绣西南”一书的中译英全文，都由他执笔。旅游公司找他编写介绍重庆风光录像的解说词，并由他用标准牛津音解说，讲得那些游三峡的洋人们欢呼雀跃，询问聘请的是哪位英国人到了中国？

不久前他去过美国，看他的儿子。就是从湖北老家来重庆做临工的那位小伙子，跟父亲学的英语，后去美勤工俭学，并已在那里立业成家，盼着父亲前去一晤。而此次赴美是受原美军 14 航空大队的一位上级 XX 将军的邀请，老程到北京出国之前，满面春风，兴致勃勃给采访他的记者自许，要去会一会在美的在台的老战友，为祖国和平统一尽力，要为中美两国军人的关系沟通，将邀请当年援华抗日的美军战友，以及在台湾的上级和同事来西南旧地重游。

胡甫琳讲完老程这段焕发青春的光彩和成果之后，却在抱怨着：“从国外回来后，他总是疲惫不堪的样子，以为是痔疮犯了。要他好好休息，要他跟我一样去办个退休，他不肯，说工作需要他。每天吃完饭就去办公室加班，不晓得又是在作啥子贡献，节假日都在上班。两个月前我硬逼着他去看病，确诊是直肠癌。他还是天天去上班，去爱国！”

这时，多年不见的胡珂也在场，她似有所悟自言自语地发起议论来：“爱国是一种病。我们这个民族天生有爱国情结，个个都是爱国的情种。从古至今，有多少志士仁人，自作多情地爱国，执迷不悟地爱，前赴后继地爱，爱得死去活来。皇帝老倌生气了，赐他去死，要他上吊自杀，或饮鸩自尽，他还要喊‘皇恩浩荡’。这些年来有的冤死狱中，还长一声短一声地呼喊毛主席快来救我呵。这些人病入膏肓不明白自己得的啥子病，那是跟癌症一样难治呵。”说得她大姐陷入一阵惶惑不安的沉思中。显然，这一天她也是胸中有难以排解的郁闷，才来到这里看望大姐和大姐夫的。

在局里工作时我认识胡珂，这位以演老太婆著称的话剧演员，是早年跟地下党员在话剧界活动的积极分子。她的初恋情人是地下党员程谦谋，黎明前牺牲在重庆 11.27 大屠杀中的烈士。她从上层亲戚家中偷看到的“逮捕人员名单”，立即告知地下党同志，脱离了险境。尽

管她还不是党员，党组织还信任并安排她把《挺进报》拿到南坪花园沟老家去油印。

但是一直阴差阳错未曾发展她为党员，她仍然坚持着正直善良爱国的品性，期望走向公平正义没有腐朽邪恶和平民主的新社会。她疾恶如仇，甚至有着比共产党员还党员的激愤，痛心疾首。其实她自己的病，并不比她大姐和姐夫的病轻一些。有时她对国家民族，对社会上不良现象的指责，发自内心的感悟和真话，常常让一些人吃惊而又暗自佩服。

在这个国家里，爱国与适得其反的话题，与当时的“六四”事件密切相关，是值得探讨的。我怕加重胡大姐忧心于老程的病情，尽量要把话岔开，便问起老程去看望儿子的情况。他要儿子回来报效祖国，儿子劝他留下，还要把胡阿姨接去自由世界共享晚年的天伦之乐。至于在外见到的老上级老战友等等，老程回来之后像泄了气的皮球说得很少很少。

晚饭时，老程终于回家来了。看得出他故作精神地跟我们打招呼，坐下来就说：“想不到真的开枪了”，“还不相信吗？”胡珂反问着。他说：“不，想起我那小子不回来，要我也不回来，说我不记取教训。幸好他没回来，要不又是个甚么下场？”

“你就是执迷不悟嘛，不吸取教训。回来做啥子？爱你的国？爱出癌症了，天天还要去爱。”胡大姐抓住机会数落起来。“回来爱我的老婆子嘛。”老程一句玩笑把大家逗乐了。他继续着：“唉，这次事件是1957年的一个轮回，也是一次升级。不知还要有多少次前扑后继的轮回，才走得出来这个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怪圈，真正成为民主自由的国家？”

“哪你回来，是要共同奋斗？”胡珂插上话。他吃得很少，独自走到窗台前仰望夜空无语，好一阵才说：“一言难尽呵，在民主国家，今天赞成民主党投它的票，明天我觉得共和党好也行。可是自从有了两个阵营以来，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你朝那一边迈出了一步，就跟射出去的箭一样无法回头。”这时，我们都意识到自己不仅生活在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度里，并且被笼罩在一个邪恶阵营的重重阴影里。深深地沉默了。

晚餐后，老程显得十分疲倦，似有许多纠结困惑难以启齿，不愿多谈。我住在郊区，便提前告辞了。劝他积极治病，留得青山在，爱国也不迟。他点头，我表示要再来。但是，我失言了，那时打电话难，更无手机。杂务缠身大约数月之后，我万分歉疚地再去过一次。

#### （四）

那天他一个人在家，说胡甫琳去为他的病四处寻医问药，要找到什么祖传秘方偏方的，他诡秘小声地跟我说：“我这个老婆子，莫看她有时候凶神恶煞的，可心地善良，心里火热呵。”屋里只有我两个男人对男人的谈话，一下子又像回到了当年在阁楼上的感觉。坐在沙发上，他喝着咖啡，我坚持还是喝茶。当然，这光景远胜于沦落中我们在一起舐伤口、发牢骚、说废话的无奈状态。

而且他特别兴奋，面容神色颇佳。我认为他的病情大有好转，大有希望。大胆无忌甚至有些放肆地又谈起赴美之行，为啥不听儿子的劝？

他谈起在美的多次聚会上，多半是曾经在一起编队抗击日本零式飞机的战友。有的在内战和朝战之中牺牲了，他显得十分沉重。听见他们的遗孀和儿女们讲述失去亲人的悲伤，以及他们滞留在大陆的老少亲友遭到的凌辱和折磨，被拷打追问，甚至弄去劳改，令他寝食难安。他说，好像句句话都是在控诉他一样。凡有战友墓碑的地方，他都去一一悼念。他的眼

神凝滞了，停下来，呷了一口咖啡。

随后，谈及战友们回忆并肩战斗的往事，个个兴奋不已。但大家深为感叹的，是二战中打败了纳粹德国，却壮大了邪恶的苏联；我们赶走了日本鬼子，却造就了一个在大陆上更加专制的政府。帮助北朝鲜入侵南韩，破坏和平，搞得全世界都不安宁。大陆百姓从此生活在水深火之中，被屠杀、饿死的中国人成千上万。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摧毁文化，践踏文物，比法西斯还法西斯……

这时，有位仁兄冷不防地委婉地说：“跟魔鬼一起作恶造孽，也会下地狱的。”我立即争辩：“现在不是正在改变吗？”

“我并不怕下地狱，怕的是一错再错。几天几夜都在考虑，也是希望：共产党会改邪归正的。不过我知道自由世界再怎么自由，也不会对一个投奔过共党的人轻易接纳。因此，决心回国。我要从改革开放中去弥补过失，减轻良心负担，亡羊补牢嘛。

但是，“六四”天安门的屠杀，东欧易帜，苏修崩溃，历史的现实越来越证明我真的错了。历史无法重写，人生只有一次。”室内寂静下来，仿佛听见了他颤悸的心跳。

沉寂中我想到长眠在朝鲜荒山野岭里的战友们，是否也有一块墓碑？国内连名字都没有公布过，究竟牺牲了多少人也没有一个说法。

便讲到有个同学的同学，受重伤昏迷不醒，战友们仓皇撤退中只把他埋在枯枝败叶里。被联军发现后，把他抬到战俘营。伤养好了，他就搞串连，像在渣滓洞作地下斗争那样。文娱晚会上，他唱京剧《四郎探母》鼓动回国。

当然他是坚决要求回国的，受到了祖国人民鼓锣打鼓热烈的欢迎，住在宾馆里。处处都有欢呼庆祝的大红标语：热烈欢迎祖国的忠诚儿女胜利归来！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看见窗外从屋顶上齐展展落地的白底黑字大标语，却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彻底交待，重新做人”、“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等等。他彻底坦白交待过自己在俘虏营里的一切思想与活动，包括他怎样串联，跟敌人作斗争。仍被开除团籍，军籍，押解回乡。

至今在一个生产队里挑大粪，而且是那个队里的专职挑粪人。战友找到他，他不知汉魏。有幸躲过了文革中被斗争被打死的可能性，但是人傻了。

老程听后，情绪有些缓和，讲起他在国外知道的真相。北朝鲜是在斯大林怂恿之下，先发制人，跨过三八线入侵南韩，打到釜山快把南韩赶下海去了。由于美国的呼吁，联合国才组成 16 国联军反击，从海上用军舰运兵到仁川登陆，向北方推进。

当时，内战尚未结束。毛泽东却野心勃勃，想趁此为社会主义阵营捞个头功，讨好斯大林。他力排众议，搬出“唇亡齿寒”，蛊惑中国人去跟联军打仗，以人海战术去对付机械化部队，其结果可想而知。联军牺牲五万多，早已有名有姓公诸于世，而我们国内谎话连篇，隐瞒一切。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大吹特吹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

据国外估算中国志愿军死亡、伤残、饿死、冻死的近七、八十万。至于南北朝鲜的军人和无辜死伤的老百姓更无计其数。挑起这场不义之战的代价，就是无数生灵的毁灭，人类遭受的又一次浩劫。

尽管我也曾听到过只言片语的传闻，但经他来龙去脉的梳理，让人如梦初醒。在一阵长

长的沉默之中，我们各自品味着咖啡和清茶。多年来蓄积在自己心中的，对这场非正义战争的印象，我实在忍不住也大放了一次厥词：

战争就是一个部轰隆作响的绞肉机，当你在惶惶奔窜中踩过横七竖八软的硬的尸体时。你会感到，你的战友，你的敌人，都是爹妈所生的儿女，有血有肉有灵魂活鲜鲜的人。倏然之间，却成了一堆堆绞出来血肉模糊的战争祭品。

而战争，却是那个独夫民贼个人野心冲动中重重挥下的一击拳头。每个战役只是指挥员在地图上划的一个圈，打下的一个点，那里便成为战争机器开足马力的屠宰场，生命的黑洞。世界上有无数个家庭留下终生的痛苦，老母的期盼，妻儿的泪水，以及成千上万襁褓里的孤儿。

当年我们就充当着这个绞肉机上的钢齿獠牙，吞噬生命，摧残人类。而且是我们跑到别人的国土上去“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算哪门子事呵？举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正义与光荣，所谓“雄赳赳，气昂昂”地去制造死亡，去拼命！去作孽！

我们谈了很多，胡大姐还没回来。老程下厨弄出一份从国外带回的意大利“通心粉”给我吃，我觉得很有象征意义，这一天我们谈得很畅快。但是，这次交谈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

数月后，噩耗传来，我立即赶到情报所。胡大姐坐在缠扎着青纱的遗像面前，动都不动，也不招呼我。很久很久，才说：“癌细胞转移到他的肝和肺上去了，痛得打滚，争扎几天几夜，不喊爹不叫娘，嘴里只是反复念叨一句话：‘我对不起世界人民！’啥意思？”

二十余年，我无言以对。

近日，读到1951年5月1日，联合国大会以44票赞成、7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谴责共产党中国为在韩国的侵略者”的决议。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则是恶名远扬的侵略军，令我惊讶，让我惶然。谁能为自己要承担侵略者遗臭万年的罪孽而无动于衷？

隐然间，我似乎也明白了老程弥留之际的呓语。本想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却在助纣为虐，残害人民，捣乱世界。他为人生的又一次的错误选择，深感内疚与痛苦。从谎言中醒来时，一切良知未灭的人都会为自己犯下的过错，羞愧、忏悔。

在临界地狱与天堂之前，他发出了撕心裂肺的良心自谴的呐喊。

2012.10.在医院

## 俯瞰 1945 年南京受降典礼遗址遐想

孙丹年

2012年9月9日，从南京山水大酒店第20层朝北的一个房间内，隔玻璃窗看下去，龙蟠路中段和珠江路两条大街成直角交叉，围出一大片葱葱郁郁的柏树园林，园林向东一直伸

展到钟山脚下，其面积应该以平方公里计算。柏树全部是挺拔的笔柏，高大茂密，估计树龄至少在 70 岁以上。密林掩映下，几乎看不见什么建筑，除了一幢小高层办公楼房之外，仅见三栋灰色平房掩隐其中。

一位朋友从酒店玻璃窗指点下面说：“这里，以前是南京黄埔军校的校园。”

我原本十分向往广州黄埔军校，多年不得一谒，却在骤然间，以大全景的角度，与南京黄埔军校不期而遇。1927 年 4 月 18 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决定，在广州黄埔军校之外，另行筹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仍然称为黄埔军校。相对于陆续开办的众多分校，它也称南京本校。

校址地点叫“小营”，可见古代就是屯兵的地方。现在，这里是南京军区司令部。一些军人家属及小孩骑着自行车，在两名岗哨的注视下，穿过军区司令部大门进进出出。从大门往里看，只见笔直的大道遥遥通向一座貌似办公楼的小高层楼房。据说，当年的军校大门为水泥砌就的方形高门，门外两边各有一个砖砌的岗亭，沿大门向两边延伸出铁栅栏。办公楼后面是军校大礼堂。大礼堂正门的门顶呈塔形，上置旗杆，门前有四组高大的双立柱。还有供校长专用的方形二层小楼、教学楼、学生宿舍等建筑设施。拥有巨大的操场，可同时容纳上万人活动集会。

据说，现存文物建筑有三处：礼堂，校舍，憩庐即蒋介石别墅。

校长蒋介石在 1928 年 3 月 6 日开学典礼上的训词很有意思：“凡是反对党的人，无论是军官是学生，都要反对他！即使本总司令不要党，请各位就反对我，就杀我！”蒋介石十分强调“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纪律”，他希望学生都成为忠于国民政府的军人，而国民政府的宗旨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相比已被推翻的清朝军队效忠于皇室，已是一大历史进步。

南京本校成立后，招收了第 8 期至第 13 期一共 7459 名学员，加上陆续从杭州、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转过来的第 5 期至第 11 期学员，南京本校一共毕业了 11000 余人。

1937 年 9 月，在日本炮火威逼下，南京本校西迁，经九江、武汉、四川、铜梁，至 1938 年 11 月到达成都，继续开办。一年多时间，学校四易其地，师生长途跋涉，艰苦备尝。迁校期间，因前方作战部队缺乏，第 11、12 及 13 期先后提前毕业，分发前线。沿途在各地招收第 14、15 期学生。其中，1936 年 8 月在南京招收的第 13 期学生，于 1938 年 9 月 16 日在四川铜梁毕业，共计 1412 人。抗战期间，黄埔军校成了培养抗日官兵的大本营，名将辈出，战功显赫，威震海外，影响深远。

南京本校撤离后，再没有迁回来。日本投降，在南京本校旧址设立陆军总部南京前进指挥所，全面筹划受降事宜。

朋友指点着下面那片开阔的柏树园林说：“这里，是 1945 年 9 月 9 日侵华日军签署投降书的地方，日本向全中国人民投降谢罪，就是在这里！”

今天是 2012 年 9 月 9 日，距离那个划时代重大转折的日子，刚好 67 周年！无意间，我撞上了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纪念日！

我隔着玻璃窗俯瞰着的，正是中华民族洗雪百年耻辱的标志性地点，正是当年全国人民欢呼雀跃泪飞如雨事件的核心时间和核心位置！为了这一时刻，从 1931 年沈阳“九一八”



事变开始，以 1937 年“七七”事变为转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中华民族进行了 14 年坚苦卓绝的英勇抗战。14 年耻辱，14 年血泪，14 年颠蹶牺牲，全部在这一刻荡涤湔雪！

引用一位亲历南京受降仪式的抗战将士的回忆：一位取名“金陵辟邪”的网友撰文说，他采访过 90 岁的远征军少校袁翔彬，据袁讲，1945 年 9 月 9 日在南京举行的受降仪式，上午、下午各进行了一次，上午 9 时在中央军校礼堂签署投降书，下午 3 时，在市内新街口十字路口，侵华日军司令向南京市民谢罪。

袁翔彬是新六军的少校营长，担负警卫职责，这两次受降仪式他都参加了。受降地点原定在湖南芷江，为了监督来洽降的日军，他们先从云南乘坐美军运输机到芷江，再乘机转南京。进城时，他的部队乘坐投降日军的卡车，全部美式装备，军姿威武。南京市民欢呼雀跃，燃放鞭炮，往军车上扔香烟和鲜花。按照命令，他把部队部署在中央军校礼堂门口。

1945 年 9 月 9 日上午，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大礼堂隆重举行。南京到处张灯结彩，从中山东路到前进指挥所三处用松柏搭建的拱门，上面写着“胜利和平”和一个象征胜利的 V 型符号。

上午 8 点 52 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空军司令张廷孟入场。何应钦走上受降席，居中而坐，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参加受降仪式的还有汤恩伯、王懋功、李明扬、郑洞国等国民党将领。盟军将领有美军麦克鲁中将、柏德勒少将，英军海斯中将等。

礼堂正中是投降签字区。受降席桌子边放着 5 把椅子，桌子中间预先放置了文具盒、文件夹和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受降席西侧是中国和国际一些高级官员，东侧是记者席。楼上是中外一般官员观礼席，大礼堂两侧各有一个签到处，备有两本签名册。

8 点 58 分，代表日本帝国政府及日军大本营的投降代表、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 7 人，在中国军训部次长王俊的引导下入场。他们在投降席后排成横队，由冈村宁次领头脱帽肃立，向受降席鞠躬。冈村宁次解下佩刀，交由小林浅三郎双手捧呈何应钦，以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政府缴械投降。

冈村宁次戴着眼镜，垂着头，一言不发。他平时非常骄横，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初，他还以拥有百万大军而不服气。可是这一刻，他低下了头。巧合的是，他面对的受降方代表何应钦，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是他的学生。

9 点 04 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投降代表”证件。接着，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用双手捧接，低头展阅。9 点 07 分，冈村取笔蘸墨，签下自己的名字。在签字的整个过程中，冈村宁次的手一直在抖，盖章时，他从右边上衣口袋中拿印章，边抖边盖章，印章盖歪了，在这样的场合又不能更改，他只得起身向受降席鞠躬，表示歉意。

日本人把投降书递过来，原本坐着的何应钦一下子站起了，双手接过。这个突然站起来的动作后来被人说成没有威严，其实是因为书桌太宽，何应钦只能站起来接。

9 时 15 分，中国战区 120 余万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完成，何应钦命冈村宁次等人退席。

第二次受降仪式，于当天下午在新街口搭建的大台子上进行，中国受降军官是何应钦上将，侵华日军投降代表是冈村宁次，冈村宁次面对南京千千万万民众，长时间鞠躬认罪。中国老百姓海啸山呼：“中华民族万岁！打倒日本！”

受降仪式结束，部队检阅仪式开始。新六军少校袁翔彬指挥着他的营，面朝主席台上的何应钦等抗战将领，以整齐划一的步伐走过，南京民众一片欢呼。

不久，侵华日军撤退。中国军人接到命令，将日本军人控制起来，他们身上所有的物品都要放下。普通日本人走不了，被老百姓围着打，往他们身上扔脏东西。日本人打出横幅标语：“向中国人民借路，送难民回家！”

在中国浴血奋战了三年的盟军高级将领梅乐斯，应邀参加南京受降仪式。就在我现在所俯瞰的这片园林中、在我看不见的原军校大礼堂里，他亲历了这一彪炳史册的辉煌时刻，亲眼目睹了战败国军人低下他们那曾经不可一世的凶蛮的头。他在日记中写下一段感人肺腑的话语：“在抗日战争进行到第九个年头的九月九日九时九分，日本人在投降文件上签了字。中国军官从日本人手中接过笔来时用的是一只手。如果中国军官用两只手接那支笔，就等于承认和日方代表居于平等地位，那是不合适的。”梅乐斯说：

**收复南京归中国人控制，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是特别具有爱国心的重大意义。南京在数百年前原是中国的京城。1928年国民政府重又以南京作为国都，甚至在日军占领8年之中，中国人还是把它作为合法的首都，虽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迫使他们以重庆为战时首都。**

2012年9月9日，我的朋友对我讲述了这一伟大转折，百年来历经践踏蹂躏、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此步入复兴之路。

但是，朋友的神态随后一转，他略为停顿，加重语气说：“这里一直不对外开放。”

我的脑袋里“嗡”的一响，意识到这个伟大转折的标志性地，长期以来被雪藏了。

对我来说，这之前，类似的情况至少还有两次：第一次是1993年，当我发现中美联合组建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抗日活动，作出过卓越的抗日贡献时，脑袋里“嗡”的一响；第二次是1995年，我第一次到长沙，为一睹爱晚亭芳容而登上岳麓山，却发现了我从来不知道的三次长沙抗战史迹——除了台儿庄，我不知道国民党正面战场也曾打过胜仗，更不知道前两次长沙会战都以中国军队的战略胜利告终！当时脑袋里“嗡”的一响：居然！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也打过胜仗？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旧址，并未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现实生活中，身边充斥着荒谬，比比皆是。一方面将并无多大历史价值的事件无限放大，例如将渣滓洞看守所夸张为“红岩”，另一方面又将历史意义无可估量的事件无限缩小，例如中国政府抗战胜利受降签字仪式的地点，长期以来被刻意隐藏。

署名“小银匠”的网友说：2005年6月，突然传说作为侵华日军南京签降地的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即将被拆除，一场“圣殿保卫战”在互联网上打响，组织者是南京军区大院子弟小学（今南京雨花小学）67届的校友们。8月，南京军区表示，尽管大礼堂没有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考虑到其特殊的历史价值及建筑风格，将予以妥善保护，制定了保护修缮方案，拟保持原貌，复建钟楼，并把破损严重的军区大礼堂改建为军史馆，与原建筑一并作为长久性

抗战胜利纪念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小银匠”评论道：广州黄埔军校旧址和云南讲武堂旧址是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定军校旧址也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堂堂的南京中央军校旧址、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地点，具有绝对重大的历史价值，这是其他军校不能比拟的，却没有列入。即使南京中央军校的原址现在被南京军区占据，是军事禁地，但这也不能成为理由。那么多历史价值不高的旧址都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怎么就不能把南京中央军校保护起来呢？

最后，用网友“乔羽的博客”的一段文字结束：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骄傲最自豪的是哪一天？地点在何处？

美国人认为是 1945 年 9 月 9 日，日本帝国正式向中国政府投降，地点是在南京黄埔路中央陆军官校大礼堂。而让美国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为何 60 多年来，中国人从未在这里进行过任何纪念庆祝活动？

而让笔者费解的是，为什么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故址至今不向公众开放？中共当局准备封锁到何时？遮掩到何时？

笔者想不出全中国有哪个地方比日军投降地故址更具有爱国主义宣传的价值，难道日寇投降不属于主旋律的范畴？

1945 年 9 月 9 日，经历 8 年坚苦卓绝的斗争，这一天，我们胜利了，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天！

恳请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故址向中国人民开放！

2012-9-14

## 轰然一声、壮烈一举

牛立华

六十年代末“农业学大寨”成了风靡一时的政治运动。

1975 年，苗溪茶场再次兴起了改田改土的高潮，第十三中队的狱警好大喜功，扬言要把陡峭的胡家坪山坡改造成保水保肥的梯田。

对于耕地面积偏少、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农田基本建设理应受到重视，把它列为全国的头等大事也不为过，然而这是一件需要切切实实努力的工作，需要科学规划，科学施工。

文革伊始，中国科学院的许多专家都被关进了牛棚，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谁还讲科学呢？

文革后期，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成了阶级斗争的样板，毛泽东钦点，半文盲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第十三中队派出几个原籍山西、河南的狱警到大寨参观了一天，顺便回乡探望父老，和乡亲们欢聚了五六天，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回来以后，不负使命，发誓要削平胡家坪的山头，喊的口号是“立下愚公志，改造大自然”，倒也中听。于是集中了一百多名犯人改田改土，还从第一中队借调了一个曾经当过工程兵的军犯，姓黄，可惜我和他极少接触，

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已经服刑四年有余，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

小黄二十几岁，思维敏捷，手脚麻利，性格开朗。平时喜欢说笑，还喜欢写点文章。在劳改犯人苦中作乐的魔术表演中，他串演小丑，嘴里叼着一根假烟卷，表情生动，逗得愁眉苦脸的犯人哈哈大笑。在悼念周恩来逝世的墙报上，刊出过他写的几首小诗，颇有文采。也看得出他有一点褒周贬毛的情绪，惹得那几个当过记者、时刻窥视他人、擅长投机取巧的“劳改积极分子”蠢蠢欲动，要批判他、斗争他。幸好狱警的文化低，看不出门道，又念及他是年轻的军犯，未予追究。

改田改土，轰轰烈烈，不计成本，不讲科学。胡家坪原本是果粮套种的坡地，每亩土地栽种了四十株苹果树，品种有国光、元帅、香蕉、红玉、紫魁、秦冠等等。林间空地种植西瓜，小麦、黄豆、花生、玉米，油菜、萝卜、红薯等农作物。农业学大寨一来，据说要“以粮为纲”，正在盛果期的苹果树被连根挖掉，送到厨房当柴火烧了。从远处山上开采了大量块石，用以砌筑堡坎，修建梯田。小黄承担开山放炮的任务，炸药、雷管都在他手上掌握着。

1976年夏，不知何故，改田改土悄然偃旗息鼓，昔日一派大轰大嗡的景象不复存在，各个中队只保留了小规模工程。十三中队的胡家坪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山，被挖得高低不平的耕地上，散散落落地堆积着乱石，往年可以收获数万斤苹果的果树早已化为灰烬，连一片落叶也没有留下，秋收成了泡影，农业学大寨的丰硕成果任由御用文人的喉舌编造，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又是一个丰收年。

改田改土的队伍解散了，小黄回到第一中队继续服刑。

一天上午，第一中队的干部宿舍区，忽然传出沉闷的爆炸声。

农业学大寨，要开山取石，听到爆炸声是经常的，并不引入注意。但改田改土半途而废，已经不再开山放炮了，为什么又闻爆炸声呢？按惯例，放炮一般安排在中午，这次爆炸是上午八点左右，似乎反常。爆炸应该在山上，这次却在干部宿舍的小院里，异乎寻常。集中劳动的犯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惊眉诧眼，莫名其妙，狱警在侧，未敢议论。

小道消息是可以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的。当天下午，一中队发生爆炸的新闻就传到了我所在的第十三中队。经过几天道听途说，小黄的壮烈一举渐渐清晰，并迅速地传遍了苗溪茶场二十四个中队和邻近的老乡聚集地区。综合那几天的传说，排除孤证，追记1976年苗溪茶场爆炸案如下：

苗溪茶场第一中队是关押军犯的农业队，昔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至大校，下至列兵，共三百余人，成了今日的阶下囚。开荒种地，养牛喂猪，为场部附近各中队的狱警和管理员提供各类副食品。从中队长、指导员到管教干部、司务长一律是转业军人。这些也当过几天兵的，在毛泽东思想毒素的熏陶下，不同程度地泯灭人性了，其中某管教干事中毒尤甚，以无产阶级专政者自居，动辄打骂犯人。骂起人来，语言粗俗，日妈操娘，不堪入耳，把犯人的列祖列宗都搬出来，统统骂个没完；打起人来，心毒手狠，拳脚并用，棍棒交加；腰间常别着警绳，尤其嗜好捆人，其暴虐凶狠在第一中队是出了名的。小黄在他手下，已经受过多次拳打脚踢，愤懑已极，但未敢反抗。

事当凑巧，某日下午小黄在厨房不远处劳动，见到一只肥猫，竟然跑到他的脚下转来转去，周围有人说：逮住、逮住。说时迟，那时快，小黄一弯腰，一伸右手，那只猫的脖子被小黄抓个正着，那猫挣扎之际，猛然一口，把小黄的左手咬出了血，小黄情急之下掐着猫脖子的右手一用力，那猫已无力挣扎，奄奄一息了。这下惹了大祸，劳改队里的犯人除了臭虫、虱子随身饲养，苍蝇、蚊子自由驰骋以外，是没有宠物的。猫、狗、鸡、鸭、兔等都是狱警们的私有财产。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三两个人一合计，既然猫已经死了，把它杀来吃了，消痕灭迹。

三天以后，猫的主人露面了，正是那位凶残卓著的管教干部。小黄被那位干部喊到了干部宿舍外面的坝子里，不由分说，一阵拳打脚踢，狱警练过擒拿贯跤，小黄这个工程兵自然不是他的对手，况且偷吃了人家的猫，自知理亏，又是犯人身份，容不得反抗，被打得眼冒金光，浑身颤抖，只管连连告饶。

孰料这位干部余怒未息，死了一只猫犹如死了他的祖宗八代，恨不得要人披麻戴孝。煞那间从腰带上抽出一根警绳，横扫一脚，把小黄撂翻在地，紧接着左脚踏上小黄的后背，两手用熟练的动作把小黄捆了个扎扎实实，然后单手提著小黄身后的绳子，让他站起来。随后，从屋里端了一把藤椅，坐在门口抽起烟、喝起茶来了。坝子里不时有干部走动，看了一眼，狱警捆犯人是司空见惯的事，谁也不以为然，不闻不问地走开了。偶尔有犯人从附近经过，斜瞄了一眼坐在藤椅上的干部，又紧盯了几眼小黄，什么也不敢说。

小黄被捆得龇牙咧嘴，不出一声；怒目而视，仇恨如火。

那位管教干部坐了一会儿，不时地斜着眼睛看看小黄痛苦的表情，慢腾腾地站起来，锁上门，走了。

捆人的和被捆过的都知道，绳子捆在身上疼痛难忍，丝毫不亚于老虎凳等刑具。医学告诉人们：疼痛是机体组织受到物理化学等因子刺激所产生的病理生理变化，是外因刺激人体神经元和疼痛感受点发出的机体病变或损伤信号。绳子紧紧地勒在身上，阻断血液循环，造成软组织损伤，肌肉断裂，皮肤破裂。疼痛不止，意味着损伤严重，乃至不可恢复，所以一般捆绳子不超过一小时，或者松一松，捆一捆，反复折磨，避免造成永久性伤残。这一次小黄被那位心存歹毒的管教干部足足捆了两个多小时，松了绳子以后，两手已经不能复原，一两个月以后，确认成了终身残疾，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两手不能伸直，手无缚鸡之力，也就丧失了谋生的能力，如今才二十几岁，这后半生怎么过呢？

据说小黄偶尔流露过悲观、愤恨、复仇的想法，难友们也曾尽力劝慰，他还是走向了极端，不惜一死宣泄胸中的怨气。

出事的这一天早晨，他预先在自己的身上捆绑了炸药，接好了雷管和引线。手里提着一个绿色的军用背包，里面也装着雷管和炸药。他去找那个管教干部，企图与他同归于尽。不巧，那个狱警出去了，找了几次都不在，狱警的老婆在另一间屋里没出来。小黄一气之下，闯进狱警的居室，用火柴点燃了引线。然后迅速退出，往监舍方向跑去。跑了数十步，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轰然一声，回头看，尘烟弥漫，那间房屋倒塌了半边。他继续往前跑，这时有人在喊：跑了！跑了！抓住！抓住！

没有命令，在田间劳动的犯人是不能离开劳动地点的，只能远望，不敢擅动。

监管区内的狱警和武警几乎是倾巢而出，大约十多个人，狱警手里拿着短枪，武警则手持自动步枪，相互保持着距离，朝小黄奔跑的方向追赶。

小黄是做了牺牲准备的，所以毫不畏惧，只见他快步爬上堡坎，蹭、蹭、蹭，攀上风干房的屋顶，迎风而立，猛然间扯开了衣襟，露出了捆在身上的炸药。追赶到堡坎下面的一群人，慌忙卧倒，一个个像遇到空袭警报似的，趴在地上，不敢轻举妄动。一个胆子大点的鼓起勇气朝上叫喊：下来！下来！但见小黄抬起头来，从容地望了望远方的天际，转了一个身，霎时，又是轰然一声，他的肉体 and 灵魂一起升上了天空。他的躯体分成了无数段，散落在周围的大地。他的灵魂在云端缓慢地飘升。

在监狱里，狱警和关押人员的矛盾是客观存在。前者是专政工具，后者是专政对象，根本是对立的。中共掌权以来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毛泽东就自称“无法无天”，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事件司空见惯，1957年以后尤为严重。因此在监狱里关押着大量无辜的受害者（毛泽东死了以后，数百万人得到甄别平反，可为实证）。作为狱警，本属执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冤假错案不是他们制造的，他们只负监守之责。按理说，只要被关押人员没有违反监规纪律，就不应滥施淫威，妄加惩罚。但是实际上，除少数天良尚未丧尽的狱警（这部分人往往被斥为右倾），还保持着些许正义感以外；多数狱警和狱卒都深受毛泽东阶级斗争谬论之毒，以对“敌人”凶狠为荣；还有少数本性就属痞子、流氓一类，他们不见得信仰毛泽东的邪说，但却往往以极左面貌出现，以凌辱虐待犯人为乐事，或以此妄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后两类狱警，实际上是在激化矛盾，扩大对立面，毁坏中共声誉，玷污政府威信，他们才是中共真正的敌人，也是毁灭中共的蛀虫。然而，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乃至在毛泽东死了之后其流毒并未肃清的数十年内，这两类人是颇受重用的。劳改队的各级领导大多由这些人担任，这就是刑讯逼供、捆绑吊打等法西斯暴行一度愈演愈烈的原因。中共官方文件多次宣扬废止肉刑，那是写在纸上给别人看的，从来没有认真实行。1972年，毛泽东针对监狱管理曾发出最高指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最高指示也只能引得一阵敲锣打鼓，扭扭秧歌，最终成了废纸，被扔在垃圾堆里了。传达了最高指示以后，监狱里的部分狱警依然我行我素，虐待凌辱在押人员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苗溪茶场第一中队的管教干部为了一只死猫大打出手、滥施酷刑，把一个年纪轻轻的军犯捆成了双手残疾，就是明证。他因此遭到强烈报复，乃至发生了这场惨烈的爆炸。

这种极端的突发事件是非常少见的，因此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尽管苗溪茶场采取种种措施封锁消息，但已经发生的事实是永远封不住的。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无论干部和犯人虽然都没有公开宣扬，私下的议论却是禁止不住的。犯人们看得很清楚，作恶多端的狱警虽没有被炸死，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老婆受了轻伤，不断地抱怨，说他凶暴残忍才遭此大祸，如果不改，不定哪天就会丢了老命。

爆炸事件发生以后，苗溪茶场组织干部学习，强调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反映，于是进一步加强防范措施，各中队的管教干部强化了对犯人的监控，对住在外工棚的人员进行逐一

审查，限制其活动范围。对有可能爆炸的物品建立和执行更严格的管理和回收制度，由干部直接保管等等。

邻近各个中队的干部，探询犯人的反应，得到的回答大都是说反改造分子自取灭亡。说这话的人心里想的却是小黄那么年轻，没把那个凶残的管教炸死，划不来。有的认为小黄虽未炸死那个恶棍，也替犯人出了一口恶气。有的赞扬小黄的行为不亚于舍身炸碉堡，实乃当代之英雄。

爆炸事件发生以后，那些平日嚣张不可一世的狱警有所收敛。捆绑吊打的现象略有减少，这是小黄的年轻生命换来的。

## 2012 年米寿三说

石天河

### 一、俚调《诉衷情》——说寿

八十八，朋友说：“这叫米寿，该庆祝庆祝。”可古圣先贤提醒我，“寿长多辱”。多辱倒也没厘头，又何须庆祝？说庆祝，无非是说说笑笑，一醉解千愁。

试看，这一个“米”字，分明是个“十字架”。两只手，上面绑；两条腿，下面挂。一个受难者的形象，不是耶稣也是一幅受刑的图画。活生生挂在十字架，比钉死，更可怕。

那耶稣，是基督教的头，活着是救世主，死了也在天堂最上头。而我，只一个被栽诬的“黑老右”，年纪轻轻，就把我交付与寒渊地狱，消磨了二十多年的青春与自由。这怎么能够比也？他是天上的神，我是地上的囚徒

算来，这八十八，只像是我儿子喊了声“爸爸”，象征我娶了妻生了子，对未来世界，还留下了一些情感的牵挂。说牵挂也没牵挂，我一生颠三倒四，经历了战争、经历了革命，也经历了斗争批判、冤里冤枉的打和罚。没炼成钢筋铁骨，却学会了一点豁达。

从前读诗，就想学李白去寻仙访友，梦到瑶台琼阁去吃蟠桃酒，和仙女，牵牵手。或者去做沧海钓鳌客，把天下无义之徒钓进鳌鱼口。想不到，几经沧海，并没有钓到鳌，却被别人用一个“莫须有”的阳谋，钓进了牛圈马厩。也许是上帝耍滑头，既不让我自杀，又不让我逃到九州之外去悠游。偏偏捉弄我，窝窝囊囊惊惊诧诧，走进人间地狱，尝遍秦皇荼毒，写了部圉圉春秋。上帝呀，你的算盘打得巧，却把我捉弄了一辈子，活得真难受。

这如今，看满地贪狼，漫天民愤，东海鲸涛，南溟鳄浪，蘑菇云的魅影，随时在头顶上悬浮。眼看着贾府裂缝的墙基，快塌的楼，何堪问，燕台谁是经纶手？与其这样心不安、气不平、看不惯、睡不着的长寿，倒不如请共工头触不周山，让我与那些肮脏腐朽的城狐社鼠一齐休。让亿兆炎黄子孙，重整河山，湔污洗垢，从头开辟晴天丽日、让中华大地披新绣。

那时候，我的名已消，骨已朽，但也许我的声音会变成电子波，仍然在空际飘游，偶然遇上一个民间的歌手，还会有新声重奏。那就是我的魂魄，一笑，千秋。

### 二、俚调《苏幕遮》——说梦

近九衰翁，几曾见、蝉衣伴舞，翠鬟斟酒？

来说人，如今世道，都不过官为上、钱为首。“天下为公”成梦幻，恋爱婚姻多老朽。《金瓶梅》代替了《红楼》，“伟哥”超越了“壮阳酒”。要不信，我请您洗个桑拿浴，管保您返老还童，体会到现代风流，才不枉潇潇洒洒人间走。要社会繁荣，国家强盛，理想的“民主”是空谈，要“自由”离不得嫖和赌。

如簧巧舌唠叨久，入耳总然嫌别扭。一摆手呵，去去！挥他走。

四顾仓皇皆陌面，浑不见沥血金陵的同道、抛骨凉山的难友。戚戚悲酸心欲裂，向谁诉，桑田沧海，拉杂烦忧难数。是何人覆雨翻云手，播弄神州，叫人与鸡犬马牛、同罹刀俎。五千年炎黄文化，虽云落后，岂可一朝丢？人，如何能堕落成猪狗？看今朝高名白脸尽变舐臀奴，一千元卖作盐姜抄手。羞呵羞！他年青史，贻笑何其丑？

叹鲁翁逝后正声微，凭谁倩文坛高座、佳人素手，挽住风前柳！

### 三、俚调《六丑》——说愁

说愁，文人愁不是个人愁，是眼前世界、后代春秋，总该把话说清楚。从前许诺过的天堂，既然是空茫乌有，就应该给那虚拟的仙宫，作个说明，说明那前辈先知画错了图，现在该正儿八经把那百多年的烂尾楼，宣告结束。

君子坦荡荡，用不着犹抱琵琶半面羞。说功劳，自然有！五关六将像《三国》，连横合纵像《春秋》，替天行道像《水浒》，自兴自败像《红楼》。一笔一笔都是账，九九归一要算到头。哪些是功劳，哪些是罪错，哪些是实验，哪些是作秀，哪些是说了假话，哪些是想做酒而做成了醋？未来的新路，要有新路标，不应该老是说九十一年，年年月月分分秒秒，走的都是同样一条辉煌路。

辉煌么？辉煌已到了十八层下的犊鼻沟，再走下去，已没有安全的出口。

聪明人不怕“三省吾身”，也不必讳言家丑。只有鸵鸟，才会用黄沙埋住自己的头，并以为别人看不见自己露着的尾巴，臭而丑。

而今，许是天堂地狱的三岔口。抱着个定了时的铁馒头，老叫稳，脚下的钢丝绳已经生锈。说做个击鼓传花的小游戏，多呆些时候，怕不怕猛可里大难临头？万一那警棍失了灵，枪口掉了头，那时候如何措手？

愁呵愁，倒不如学那个姓胡的红小鬼，掀翻权威的偶像，把一切冤假错案都付与那一江春水向东流，大家来选一条利国利民的康庄路。只有无私无畏，才可能和十四亿人民同唱一支信天游，同喝一杯舍得酒。才不会在千秋后世，让那些翻历史的“臭老九”、嚼舌头，给那些城隍庙前的“小鬼们”，留下无情的咒诅。

我劝诸公，愁也不须愁，可别老想等到那地球向西转，半夜三更出日头。



## ——給五七难友的第五封信

任 众

五七难友们：大家好！

我们虽然心志相通，但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历经数十年的申冤呼吁至今未能得到当局的关注，使我们感到绝望；第二是我们难友的平均年龄都已在八十岁以上，对于维权之事从身体上已是有心无力，难以行动与发声了；第三因为多种原因影响了我们的情义；第四是国安与维稳办的人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对我们活动的阻扰，等等。

中共中央十八大即将召开，我们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我们不但要争取“反右问题”的彻底平反与赔偿，我们还应当对历史的真相负责，不容许强权任意扭曲与篡改历史，我们是活着的历史见证人，我们要写出文字，我们要发出声音！

我看过许多难友給“反右 55 周年纪念册”写来的短文，有的文章催人泪下。

“纪念册”、“往事微痕”、“五七心声”以及全国各地难友们所撰写的文章与书刊，都是珍贵而又真实的历史纪录。正是：欺骗与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历史。

难友们，振作起来，继续我们捍卫尊严的维权，我们应更广泛地呼唤与催生民主进程与政治改革，以及清算毛泽东的罪恶。

基于以上原因，我有如下建议：

1. 加强老友间的活动，内容要丰富多彩，如文章书稿的交流，讲故事，展才艺等，以增进友谊与健康；
2. 活动时间地点不定，有邀即至，除有人买单外，一般是 AA 制付款；
3. 参加人不仅限于难友，可邀请自己的友人参加，让我们共同受到启蒙、感悟历史；
4. 对于“维稳”干扰一事，我们首先消除恐惧心理，因为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他们缺乏历史知识与生活经验，他们是错误命令的执行者，但他们不是我们的仇人，他们甚至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有责任教化他们，不要驱赶他们，而且欢迎他们坐在我们当中，让他们能如实地向上级汇报，我们的活动与诉求就是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大家能团结起来，将维权进行到底！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不知是否得当，与友人商讨。

金秋时节祝难友们健康快乐！

任 众 2012 年 10 月 2 日

## 《黑皮书》读后

谭 松

十年前，在市歌剧团一间破旧狭窄的小屋里，我第一次见到李文书，那一天，他向我讲述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他富有磁性的浑厚的男中音，牵引着我的心，在他悲欢离合九

死一生的波峰浪谷中起伏翻腾。其间，他两度哽咽失语，泪流满面。一是讲到他被迫离婚时，二是讲到他女儿不幸遇难时。他是个硬汉子，不愿我看到他的眼泪，他转过身，默默伫立。

我也默默无语，任何安慰的语言都苍白无力。小屋里笼罩着悲绝的沉寂。

当晚在回家的路上，我疲惫万分，身心仿佛不堪重负。第二天，在写他的经历时，我数次停笔，心胸隐隐作痛。

我作为旁听者尚且如此，当事人这些年又是何等感受？

可是，没想到近十年后，他以一种比较超脱的心态和语气，一点一滴写下了他完整的人生，其内容，从当初我记录的一万八千字扩充到十七万字。

我整整读了一天，又是从早到晚。

虽然我对他人生的主要经历已经十分熟悉，但《黑皮书》仍然如十年前一样，回肠荡气，牵引着我的心，在他悲欢离合的波峰浪谷中起伏翻腾。

透过文字，我既看到那个年代癫狂的社会舞台和生活戏剧，也看到了一个“演员”悲凉的命运抗争和情爱吟唱。读完，我产生一个强烈的冲动：如果我是一个导演，如果我有创作自由，我一定要将《黑皮书》搬上银幕和舞台，让千千万万的人、让识字和不识字的人、让说中文和说外文的人，看到这片东方土地上的一段千古绝唱。

可惜，我不是导演。更不幸的是，眼下仍然看不到李文书六十年前就渴慕的言论和创作自由。

庆幸的是，李文书用他在独特年代的血色人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独特而弥足珍贵的剧本——《黑皮书》，他在他的黄昏暮年，忍着挖掘旧伤的痛楚，一点一滴完成了他的“舞台”使命。

由此，我不禁产生一种渴望，一种呼喊的渴望——

**我们民族的后来者们、那已出生和未出生的同胞们，当那一天自由的阳光终于照耀着这片浸润着无数父兄前辈鲜血的土地时，你们能够翻开这本血肉文本，用你们的才华、良知和奉献，让世人听到、看到一个已逝去的、黑色舞台上的血红演出。**

如此，让李文书和李文书式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在神州大地上上演。

[编者按]《黑皮书》即《小鼠黑皮书——五七小右派李文书口述个人史》，笔录编著者是文芒降B，系由香港百年中国历史真相出版社，并与大陆民间刊物《往事微痕》以第71—72合期特刊方式出版的。著名法学专家郭道晖为此书写的序言《揭露黑暗，也看到“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对《黑皮书》有兴趣者不妨找来看看。